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開膛手傑克的魅惑：道德懲戒、理性規訓與醫療想像

The Ripper Fascination: Morality, Discipline and Medical Imagination

doi:10.6752/JCS.200803_(6).0006

文化研究, (6),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 2008

作者/Author：陳重仁(Chung-Jen Chen)

頁數/Page：107-15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3_\(6\).0006](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3_(6).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The Ripper Fascination:
Morality, Discipline and Medical Imagination

—Chung-Jen Chen

開膛手傑克的魅惑：
道德懲戒、理性規訓與醫療想像

陳重仁

本論文的完成，必須感謝黃宗儀教授的指導，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陳金山教授在醫學解剖與醫學史方面提供的諮詢。本文並承蒙李有成教授的啓蒙與詳細過目指正，以及《文化研究》兩位匿名審查者指證論文疏漏，並提供詳盡寶貴的修正意見與思考方向，作者謹此一併致謝。本文初稿曾經刊載於《文化研究月報》第六十期（2006年9月25日出版），經過流通以及意見交換之後，已進行深化發展與大幅修改。

陳重仁，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電子信箱：cama1over@mail2000.com.tw

摘要

本文試圖要回答的問題是：何以發生於西元1888年倫敦東區的開膛手連續殺人命案，到了今天依舊令人感到著迷？何以妓女的身體會成為公開處決與道德管束的對象？何以如此殘暴的公開處決會具有道德懲戒的教化寓含？何以開膛手要是個醫師？開膛手的醫師身分，為何與帝國的維繫以及追求現代化工具理性產生關連？

百年來眾多有關開膛手身分與行兇動機的推斷中，皇室涉案論一直是最能增加想像空間並營造恐懼想像的推論，電影《開膛手》正是此推斷最具代表性的電影呈現。本文藉由交叉比對電影文本、解剖醫學史、解剖劇場空間呈現的權力關係，以及西方繪畫藝術與解剖醫學的互文脈絡，檢視西方民眾長久以來對屍體解剖具有的恐懼，並說明何以大體解剖延長施加於身體的刑罰，成為道德制約工具。本文試論受害者身體與醫師形象的想像與重現，是開膛手魅惑歷久彌新的主要原因，並從藝術品呈現、解剖法令制訂以及整建社會觀瞻各方面，探討何以開膛手凶案在文化想像的脈絡中具有執行道德懲戒與建立知識體系的雙重意涵。

開膛手的想像營造中刻意挪用時空錯亂的醫療科普觀念，渲染現代醫療所象徵的工具理性。藉由美化開膛手具有專業醫療知識的形象，凸顯醫學象徵紀律與理性的印象，並從中玩弄醫學啟蒙辯證的內在矛盾與衝突：原本應該拿手術刀救人的醫師，在開膛手文學的集體想像中，轉換成為陰森冷酷的道德執行者。

關鍵詞：開膛手傑克、《開膛手》、倫敦東區、醫學史、道德、規訓、解剖劇場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y are Jack the Ripper and his serial killing in East End London holding so much fascination? why does the body of East End prostitutes become the target for public execution and moral disciplining? Why does the Ripper have to be a doctor? And, why does the Ripper, as a doctor, closely associate with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mpire and the sustena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in modernity?

By discussing *From Hell*, a film based on the royal conspiracy theo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ascination with the Ripper derives not so much from the facts of the murders, but the combination of elements of morality, discipline and medical imagin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ipper as a doctor-killer are most vital for turning the Ripper into an executioner of public punishment and moral disciplining. Wi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edical history of human anatomy, the power relation embodied in the anatomical theater and th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medical science and paintings of anatomy scen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unction of medicine to enforce moral disciplining and to establish a knowledge system. On the mutilated bodies of prostitutes, discipline is activated, morality rehabilitated, and knowledge system established.

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at the Ripper fascination is a result of anachronistic manipula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as the ultimate form of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The Ripper, once presented as a doctor, is an embodiment of highly exclusively and elite medical knowledge. As a result, the Ripper is presented now as a defender for discipline and modernity. Such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Ripper indicates an inlaid paradox of the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hands of the doctors that used to save lives are now executing moral punishment by taking lives.

Keywords: Jack the Ripper, *From Hell*, East End London, medical history, morality, discipline, anatomical theater

有一天人們會回頭看，然後說，是我催生了二十世紀。

——開膛手傑克

吾將竭盡吾之能力與智慧，以己之才幫助病患；

戒用醫術對任何人等以毒害與妄為。

吾將以純潔與聖潔為懷，終生不渝。

——希波克拉底醫師誓詞 (The Hippocratic Oath)¹

一、前言

1888年秋天，倫敦東區的白教堂(the Whitechapel)一帶在短短10個禮拜內發生5起連續殺人案，受害者都是在倫敦東區接客維生的妓女，所有的受害者都遭開膛手利刃封喉，其中幾位還慘遭剖腹肢解，甚至有腹腔器官被兇手取出或惡意破壞。²命案發生的地點皆為車來嚷往的東區巷弄，這一帶也是居住人口相當密集的区域，但是在警方的

1 希波克拉底醫師誓詞原文為希臘文，醫學史家大多認定現存版本是歷代多位名醫潤飾改寫後的成品。本文引用中文譯文節錄於波特(Roy Porter)編輯的《劍橋插圖醫學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cine*)中文版(2008[2001]: 49)。

2 倫敦東區在開膛手犯行的時期是治安相當敗壞的地區，街頭上出現兇殺搶案對當地居民來說是相當習以為常的事情，加上開膛手犯案之後也陸續出現許多仿效凶案，開膛手真實作案的命案數字一直是個相當大的爭議。一般研究者多採證1894年邁克藍燈(Sir Melville Macnaghten)的說法，由犯案時間與手法，加上輔助證據的佐證，認定這5位受害者都是遭到同一位兇手的毒手(轉引自Odeh 2006: xvii)。儘管如此，光是確切的受害者人數就已經是個眾說紛紜的迷團，百年來不同的研究者紛紛提出不同數目的受害者人數，甚至最高的受害者人數還有高達9人的說法，作案時間也從1888年推論到1891年不等。這樁連續殺人案連受害者人數都無法斷定，甚至連作案期間也無法推測，這些無解的懸疑反倒強化了開膛手在民眾心中的恐懼，也強化了開膛手鬼魅般的形象。本文討論採證最廣為接受的推論：凶案發生期間為1888年的8月31日至11月9日，共有5位受害者，在最後一起分屍命案之後，開膛手就此不再犯案。關於命案的種種臆測，請參閱Sugden(2002: 7-19)或Begg(1988: 213-215)兩位著名的開膛手研究專家對開膛手傑克命案前後多起命案的分析。

調查中，不但沒有任何可供採信的目擊證據，甚至沒有人聽到受害者呼救的聲音。³命案發生之後，警方收到連續數封疑似兇手寄來的信件，寄信地址寫著「來自地獄」(From Hell)，信件內容更是極盡挑釁之能事，而信件署名為「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開膛手傑克名號就此而來。⁴連續命案與開膛手的署名信件經媒體大肆渲染報導之後，倫敦人人自危，頓時開膛手傑克的名號成為人人談之變色的殺人惡魔。

百年後，開膛手犯下的惡行依舊是歷史謎團，誠如畢德(William Beadle)所言，「白教堂區當年的夢魘，如今也成了我們的夢魘」(Beadle 1995: 147)。環繞著這5起連續殺人命案的種種臆測與遐想從未曾停歇，有關命案的種種，依舊是引發集體想像的最佳題材。正如凱利(Alexander Kelly)回憶兒時願望所提，「小時候我經常想，如果有天使許諾我3個願望的話，我第一個就想知道，到底誰是開膛手傑克」(Kelly 1973:14)。諸多關於開膛手的待解或無解謎團永遠為人們增添許多想像空間。同樣地，百年來不乏懷著解開此歷史謎團的壯志之士，不管是業餘或是專業的警察、偵探、小說家或是電影導演，都為開膛手的連續命案提供各種的推理與臆測。各種推論開膛手作案動機與真實身分的理論琳瑯滿目，每隔幾年媒體上就會出現所謂的「最新命案發現」，百家爭鳴的程度為研究開膛手建立了「開膛手學」(Ripperology)的名號，甚至以開膛手為題材創作的作品，諸如小說、劇本、漫畫、電視劇、歌舞劇、電影等等創作，也被冠上了「開膛

3 有關命案的目擊證詞要不是出入極大，就是前後矛盾或是不合常理推斷，因此研究開膛手凶案的學者也大致認定眾多警方訪查的目擊證詞大多不足採證(Sugden 2002: 15-17, 36-40, 84-89, 167-176, 311-312)。

4 開膛手傑克的名號來自於署名信件中的親筆簽名，這些信件大抵是作案過程中寄給報社與警方的信件，當中經常出現諸如「我的刀子又尖又利，有機會我一定會再犯案，祝好運」或是「我常聽到有人說警方已經逮到我了，不過他們連我是誰都不知道咧」等挑釁言詞，甚至其中一封寄給警方的來信還夾帶半顆受害者的腎臟，「另外半顆我烤來吃了，還挺好吃的」。信中也坦承犯案對象鎖定為妓女，並且指稱被害妓女乃罪有應得。警方認為部分信件真實性極高，也從此將兇手稱為開膛手傑克(Evans and Skinner 2001: 214-215, 719-20; Storey 2004: 155)。

手文學」(Ripperature)的名稱。融合歷史真相與個人想像創作的「開膛手傳奇」(The Ripper's Legacy)儼然已經成為「歷史上少有現象」(Odell 2006: 239)。

各界對於開膛手傑克的興趣起因或許不一，對於感到興趣的題材也不一定一致，不過，對於受害者的身體感受到的恐懼與反感，卻可能擁有相當一致的反應。事實上，百年來對受害者身分的重重調查，反倒使得這些受害者的身體也跟加害者一樣取得了謎樣的地位。凶案中慘遭支解的身體固然駭人聽聞，但是5位受害者共同的身分與生活背景，在某種程度上卻加深使用暴力的合理性：開膛手文學似乎有合理化暴力濫用的傾向，種種凶案推論幾乎也都暗示受害妓女行為不檢、長期酗酒、家庭失和、婚姻破裂的背景。由此觀之，受害者慘遭屠殺的裸露身體成了強化開膛手傑克的魅惑光環，開膛手鬼魅般的形象因此增添了一絲道德制裁者的想像空間：這些遭受封喉、剖腹、切割、支解、移除器官的受害身軀，傳達出某種懲罰儀式的意涵，她們違反禮教、放浪形骸的一生，終將在利刃制裁後告終，這樣的想像視野多少帶有道德審判與懲罰制裁的眼光。

一般觀眾所熟知的開膛手形象，多半是頭戴高頂禮帽、身披黑色長披風、帶著磨得光亮的利刀與一只裝著凶器的皮箱在暗巷中出沒，這個神秘的身影是開膛手魅惑的根源所在。這個廣為流傳的開膛手形象通常要符合幾個特質，首先，他必須是個男性，他必須以特定的裝束現身，而且，在許多的開膛手文學版本中，他必須要是個醫生。放在跟受害者身體的相對位置來看，開膛手具有醫事的專業不僅有推理上的依據，也滿足了執行道德懲罰的集體想像：由一個最瞭解身體構造的专业人士操刀，這樣的支解與切割，就更具有深刻的處罰意涵。

本文藉由討論2001年好萊塢拍攝的開膛手電影《開膛手》(*From Hell*)，探討開膛手文學中的身體意象、道德制約與醫學想像。本文討論開膛手百年來陰魂不散的魅惑，將開膛手命案置入解剖醫學史與帝國發展的脈絡，檢視西方民眾長久以來對屍體解剖具有的恐懼與禁忌，試論受害者身體與醫師形象的想像與重現，是開膛手魅惑歷久彌新的主要原因，並從藝術品呈現、解剖法令制訂以及整建社會觀瞻各

方面，探討何以開膛手凶案在文化想像的脈絡中具有執行道德懲戒與建立知識體系的雙重意涵。

開膛手的想像營造中刻意挪用時空錯亂的醫療科普觀念，渲染現代醫療所象徵的工具理性。藉由美化開膛手具有專業醫療知識的形象，凸顯醫學象徵紀律與理性的印象，並從中玩弄醫學啓蒙辯證的內在矛盾與衝突：原本應該拿手術刀救人的醫師，在開膛手文學的集體想像中，轉換成爲陰森冷酷的道德執行者。而在開膛手想像所建構的世界中，在血液四濺、肉塊切割的妓女身體上，集體慾望與暴力獲得宣洩，道德與秩序也獲得重整。

二、開膛手與皇室涉案論

百年來，「開膛手學」在英國以及英國以外的國家吸引了許多學術界與業餘愛好者的投入。開膛手所留下的歷史懸案吸引了各種角度的詮釋與創作，開膛手一直是影視娛樂熱愛的題材，百年來以開膛手爲題材的影視創作至少有311筆。⁵此外，開膛手也具有歷久不衰的魅力，每隔幾年就會有以開膛手爲題材的電影創作，⁶就連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也有兩部以開膛手爲題的作品。⁷

5 以開膛手傑克爲題材拍攝的電影、電視作品，或是改編、諧擬等創作，歷年來共有311部。本統計數字來自網路電影資料庫(The Internet Movie Database)：<http://www.imdb.com>。(瀏覽日期：2007/8/15)

6 根據梅可(Denis Meikle)的著作《開膛手傑克：謀殺與電影》(*Jack the Ripper: The Murders and the Movies*)統計，在1915年至2001年間，共有63部開膛手電影。而且開膛手的螢幕熱潮並未因爲時代久遠而消退，光在2001年就有4部開膛手影片上映，除本文討論的《開膛手》之外，尚有《轉世情迷》(*Bad Karma*)、《到底誰是魔鬼》(*Ripper: Letter From Hell*)與《失落的世界》(*Sir Arthur Conan Doyle's The Lost World*)3部影片(Meikle 2002: 212-235)。

7 希區考克自稱對開膛手的題材相當著迷，他在1927年即拍攝他的第一部開膛手電影《房客》(*The Lodger: A Story of the London Fog*)，他當時只有26歲，而多年來開膛手也一直是希區考克一直想要重拍的電影，之後在1957年希區考克終於如願以製作人的身分再度拍攝他的第2部開膛手電影《歐達摩爾先生的手》(*The Hands of Mr. Ottermole*) (Meikle 2002: 49-52, 212, 215)。

本文討論的開膛手影片《開膛手》是二十世紀福斯影片公司(The 20th Century Fox)於2001年出品的影片，本片由好萊塢明星強尼·戴普(Johnny Depp)主演，這部作品不但是好萊塢最新的開膛手影片，也是迄今在票房表現上最為搶眼的一部開膛手影片：該片在世界多國都是票房冠軍影片，開膛手的魅惑也在大明星與好萊塢的魅力傳染下成了跨越國界的傳奇。⁸

《開膛手》的票房表現，說明了即使在百年之後，世界各地的觀眾對於開膛手鬼魅般的形象依舊保有高度的興趣。但《開膛手》一片在開膛手文學中具有的地位或許不只是它亮眼的票房表現，還有影片採信的犯罪推論。此犯罪推論在種種開膛手理論中是最受矚目也最能持續引發民眾想像的一種推論。本片拍攝的靈感來源是1980年代紅遍英國的一本同名圖像小說(graphic novel)，⁹這本圖像小說則是以奈特(Stephen Knight)的《開膛手傑克：最後的解答》(*Jack the Ripper: The Final Solution*)為發想基礎，而奈特的這本書，在數十年來開膛手研究中，是最具高度評價與影響力的推論之一。¹⁰也就是說，影片《開膛

8 《開膛手》在美國、澳洲、比利時、德國、西班牙、法國、冰島、義大利、荷蘭等國都拿下票房冠軍。有趣的是，這部影片在英國上映的時候卻僅只拿下第6名的票房成績。關於《開膛手》一片在世界各國的票房表現，請參見網路電影資料庫(IMDbPro)的專業版資料。

9 此圖像小說由作家摩爾(Alan Moore)創作故事劇情與對話，另由畫家坎貝爾(Eddie Campbell)負責圖畫的創作。圖像小說是一種圖像與寫作的聯合創作形式，通常是長篇創作，情節與對話的複雜程度遠超過短篇漫畫的呈載負荷，閱讀群眾也鎖定青少年以上的讀者。

10 奈特的這本著作自發行以來即引發相當大的爭議與迴響，奈特提出的「皇室涉案論」(royal conspiracy theory)具有相當高的戲劇張力，也提供了此案一直懸而未破的一種解釋，成功地為開膛手的歷史懸案增加了更多的臆測與想像空間。奈特的推測自出版以來即成為眾多開膛手研究者挑戰的對象，但是這本書一直在開膛手研究中維持相當重要的地位，不但是最廣為閱讀的開膛手書籍之一，也成了後續許多「皇室涉案論」的靈感來源。有關此書的影響力請參考網站「開膛手傑克檔案」(Casebook: Jack the Ripper)關於皇室涉案論以及奈特作品的討論。

<http://www.casebook.org/suspects/knight.html>。(瀏覽日期：2007/9/20)有關皇室涉案論的種種研究與演變，請參考Hinton(1998: 194-196)。

手》不但承襲了一脈相傳的開膛手犯罪推論傳統，也最能夠展現開膛手歷久彌新的魅惑。

奈特所提出的皇室涉案論，推定當時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皇孫亞伯特王子(Prince Edward Albert Victor)是引發一連串凶案的起因。此說推論亞伯特王子當時與一位住在克里夫蘭街(Cleveland Street)名為安妮(Annie Elizabeth Crook)的平民女子有染，並產下一女，此外，民女安妮信仰的天主教也被視為鬆動王位繼承道統的威脅。女王得知消息後十分震怒，下令徹查。特警隊於是掃蕩王子與安妮在東區的住所，將兩人帶回偵辦，而兩人產下的女嬰當時則在友人瑪莉·凱麗(Mary Kelly)的照顧下得以倖免。

女王的御醫高爾爵士(Sir William Gull)也接獲女王的命令徹辦此案，他將安妮送往醫院進行腦前葉切割手術，術後的安妮喪失所有記憶，並且被秘密安置在一所療養院中。但是安妮的幾位妓女朋友已經知道這件秘密，因此也成為高爾醫師亟欲剷除的對象。當時亞伯特王子身染梅毒，生命岌岌可危，高爾醫師認為這個不治之症是這些東區妓女帶來的禍害，憤而在執行女王命令的時候採取極為血腥殘暴的手法，這幾位知道秘密的妓女全都遭受到開膛剖腹的懲罰。¹¹

倫敦街頭連續出現殘暴的凶案引起倫敦各界譁然，派駐於東區的亞伯霖警探(Inspector Abberline)銜命辦理此案，亞伯霖警探在東區累積許多辦案的良好聲望，不過他卻經常倚賴吸食鴉片酩來刺激辦案靈感。在亞伯霖的積極偵辦下，命案出現眉目，並且也預知瑪莉·凱麗即將成為下一位獵殺對象。在亞伯霖的營救下，瑪莉·凱麗帶著女嬰逃離倫敦，一名暫住在瑪莉·凱麗住處的法國妓女枉死刀下，而亞伯霖最後也為了保全秘密服毒身亡。

11 這4位受害者名為尼可拉斯(Polly Nichols)、查普曼(Annie Chapman)、史崔德(Elizabeth Stride)與艾道斯(Catherine Eddowes)，即是開膛手凶案的前4位受害者。

三、公開處刑與道德懲戒

展示在這些受害身體上的暴力，不只是除去一個悲慘生命的武力展現，更是暴力恣意凌虐摧毀的成果，以道德懲罰的角度觀之，更是道德制約的極度展現。在5位受害者當中，最後一位受害者瑪莉·凱麗受害的圖片與報導，是最具震撼力也最經常成為開膛手文學創作的焦點。¹²跟大部分的開膛手電影一樣，電影《開膛手》也選擇瑪莉·凱麗遭受處決的一幕作為全片的驚悚高潮。放在作品改編的脈絡來看，從圖像小說到電影製作，最後一位受害者同樣是許多創作者放手營造開膛手殘暴形象的重要施力點。本片原著的圖像小說使用殘暴的對白勾勒高爾醫師瘋狂失心的妄想，而電影版本則是占了很大的便宜，靠著使用聲光效果製造陰森的氣氛：這一幕處決的場面靠著忠實複製凶案場景以及重現潑濺於牆面上的大片鮮紅血漬來營造驚悚的效果，穿插解剖刀的特寫鏡頭，並搭配陰森瘋狂的旁白配音。電影導演刻意營造低沉壓抑的嚙語與回音效果，更顯得兇手在支解受害者身體時的喪心病狂。比對現存命案現場的照片，電影《開膛手》對於凶案現場的空間呈現相當忠於原凶案場景照片與辦案員警口述紀錄：屋內擺設破落凌亂，窗戶有一處疑似入侵者破壞的破洞，受害者慘遭支解的身體躺在房內角落的床上，床邊桌面被使用來擺置凶器並堆放切割下的肉塊，屋內的壁爐即使在凶案發生數小時後依舊保有餘溫。《開膛手》特別強調受害者身體慘遭凌虐的殘暴意象，用意在於點出施展在妓女身體上的暴力已經不光是要終結一個卑微的生命，這樣的暴力展現出一種近乎儀式的虔敬與專注。影片仔細鋪陳開膛手作案前宛如儀式般的準備過程，彷彿光是快刀奪取生命已不足以展現儀式的莊敬，必須是一道冗長繁瑣的支解儀式與暴力宣洩，方能達到執行制裁

12 最後一位開膛手受害者的真實身分在開膛手學研究中一直具有很大的爭議，有人並不認為真正的受害者就是瑪莉·凱麗，也有人提出該案並非開膛手所為，本文討論的影片也不認定受害者就是瑪莉·凱麗本人。惟便於討論，本文在討論第5位開膛手受害者時，仍然沿用瑪莉·凱麗為受害者的原始說法，泛稱第5起開膛手案件為瑪莉·凱麗凶案。

身體的目的。

儘管影片對於血淋淋的屠殺鏡頭多採取遮掩與暗示的手法，未能直接近距離呈現死者的身體全貌，但從影片中開膛手刀起刀落的俐落手法以及失心發狂的囁語旁白，觀者不難推斷死者的慘狀。從電影據以為推論基礎的警方檔案看來，殘暴的虐殺意象呈現也確實符合檔案紀錄的真相：根據警方的調查報告，瑪莉·凱麗的遺體遭到嚴重的破壞，受損的程度已經無法從外型辨認身分，「唯一能夠確認身分的地方，只剩下她的耳朵跟眼睛」(Magellan 2005: 132)。法醫龐德(Dr. Thomas Bond)的鑑定報告，對於身體支離破碎的程度更有相當詳細的描述：

整個腹部與大腿的表面遭到切除，腹腔內的器官全數掏空。胸部遭到割除，手臂被剃下，並有多處深刻的砍傷，臉部遭受嚴重損害幾已無法辨識。頸部的組織遭到切除，傷口深可見骨……臉部的砍傷來自多個方向，鼻子、臉頰、眉毛與耳朵幾乎全遭到割除……嘴唇慘白，有幾道斜切的銳利傷口，一路切到下巴……五官布滿多道不規則傷口……心包外露，心臟則已經遺失。(轉引自Palmer 1995: 108-09)¹³

受害者慘遭激烈的手法殺害是歷史的事實，但是，何以在諸多開膛手的想像中都需要特別強調受害者身體的慘狀？開膛手傑克雖被稱為犯罪學上第一位連續殺人魔，但是無論就受害者的人數或是殺戮兇殘的程度來看，開膛手傑克卻還不是最令人驚駭的連續殺人兇手。因此，我要問的是，何以開膛手刀下受害者的身體得以引來百年來的想像臆測？何以支解的軀體對於理解這起凶案具有重要的意涵？何以受害者妓女的身分在開膛手的魅惑中具有關鍵的地位？何以受害者的身體寓含道德教化與規範懲戒的意義？

電影角色、身世背景的設定大抵與開膛手學的推論相符，如此

13 關於開膛手凶案詳細的解剖驗屍報告，目前仍有部分檔案被英國警方列為機密檔案尚未對外公佈，帕默(Palmer)書中引用的報告是公開報告中較為人引用的段落，較詳細的警方驗屍報告請參見A. P. Wolf(1993: 61-69, 88)。

的角色設定也為受害者身體以及道德教化與規範懲戒締結了緊密的聯想空間。由5名受害者具有的共同特徵來看：他們都是步入中年的妓女，本來在從事娼妓工作之前都有不錯的家庭生活，但因為際遇造化，喪失了美好的生活而流落街頭，之後不得不為了謀生而出賣皮肉，但卻也因此深陷人間煉獄，在同伴的牽引與環境的壓力下，酗酒成性，行為益加放蕩不檢，5名受害者當中更有人因此肆無忌憚地於公眾場合展現同性戀的傾向。由電影的角色鋪陳看來，這些東區妓女之所以慘遭剖腹殺害，是因為她們行為荒淫無度、放蕩不檢，所以才會流落街頭，也才會受到如此殘暴的懲罰。也就是說，這些人逾越了社會容許的道德、婚姻以及性的合法尺度，因此儘管民眾對這些受害者的遭遇或許抱持同情，但他們遭受殺害的際遇卻也跟嚴酷懲罰的意涵產生更為緊密的連結。

根據沃考維茲(Judith R. Walkowitz)的說法，開膛手凶案具有深刻的性別暴力意涵，尤其在空間的呈現上，這起凶案更是具有「區隔社會空間」的寓意。受害妓女在黑夜裡的東區巷道中遭到殺害，足以顯示這些不潔與危險的領域並不屬於女性所有，因工作需要而走入這一禁制地盤的女性，就這標準判斷，已經屬於道德觀念與行為操守上迥異於常規的「特種」行業女子，也因此，這些女子的人身安全也不受道德的規範與保護。沃考維茲將這樣的現象詮釋為男女有別的空間政治：女性在空間的使用上局限於居家室內的空間，唯獨男人掌有外出穿梭公共空間的權力，《開膛手》因而呈現出「男性暗中運作對女性的壓制，從壓抑中顯現權威」(Walkowitz 1982: 203-204)。沃考維茲認為，這些妓女之所以遭到懲戒，是因為她們逾越了「空間的區隔」，她們不潔不忠的身體跨越了安全封閉的居家場域進入危險開放的空間，也因此，她們遭到處分全是因為當事人的不安分與行為逾越尺度(Walkowitz 1992: 191-192)。將此論點置放於影片的閱讀依舊成立，在這樣的空間權力展示下，加上影片中不斷強調媒體對受害女性身分的渲染，已經將開膛手凶案轉化為一樁性別驚悚通俗劇，成為道德教化的題材與制約良家婦女的最佳典範：在成功營造集體恐慌之後，媒體

已經成功將這起瘋狂命案轉化爲一齣黑色男性狂想曲。¹⁴

沃考維茲對開膛手的研究由她長期一貫的研究主題出發，以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與社會階級的關懷角度切入，從《賣淫與維多利亞社會》(*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到備受矚目的《恐怖樂趣的城市》(*City of Dreadful Delight*)，社會道德與城市空間施展在女性身體的制約管束一直是她密切關注的主題，紮實的歷史研究與獨到的見解也爲沃考維茲在此領域建立起一家之言。但是沃考維茲對開膛手凶案中性別暴力的解讀卻可能失之偏頗，過於依賴性別暴力的閱讀角度，對開膛手凶案投射出的社會情緒可能有過於同質化的詮釋。根據當時的報紙報導，開膛手連續命案初期並無法肯定兇手鎖定妓女作案，即使在報紙披露開膛手以妓女爲作案對象之後，開膛手凶案的陰影顯然也不是只有籠罩在東區妓女身上，當時倫敦大小報社的報導幾乎一律將開膛手描述爲「半人半獸」的形象(Sugden 2002: 118-119)，這樣的恐懼顯然不是只有東區街頭的娼妓才感受得到：當時報紙報導，穿梭倫敦街頭的「良家」婦女與穿著西裝筆挺的男士都會隨身攜帶短刀防身，這足以表示，女人怕開膛手，男人同樣也怕開膛手。沃考維茲在論述中強調性別差異在開膛手凶案呈現的空間制約，儘管也帶入種族與社會階級的思考，卻仍有將案發期間社會普遍蔓延的恐懼氣氛同質簡化爲性別暴力的疑慮。

14 《開膛手》刻畫的嗜血媒體以及透過蒙太奇手法表達的報紙報導狂熱，是相當符合目前所知的歷史現實呈現，媒體傳播在維多利亞時期城市發展扮演的角色是很受到關注的研究議題，對於開膛手凶案的傳播以及對於集體恐懼的營造也占有關鍵的地位。沃夫與福斯(Michael Wolff and Celina Fox)認爲媒體的發展是「維多利亞時期都會化發展過程中同時存在的現象」(Wolff and Fox 1973: 559)。報紙的發行量首次突破萬份，一般民眾也可以很容易買到各樣的報紙、雜誌與評論，或者是套用紐堡(Victor E. Neuburg)的話，以新聞報導爲主的「街頭文學」(street literature)唾手可得。這同時也是史上首次公眾意見可以在媒體上討論(Wolff and Fox 1973: 559-560, 565; Neuburg 1973: 191-192, 198-199; Altick 1973: 60-72)。此外，跨越大西洋的電纜與電報也架設完成，這也是史上首次報紙得以發揮國際性的影響力，報業也因此出現激烈的同業競爭(Souden 2005: 6-9)。影片中描述開膛手凶案成爲報紙媒體大量消費的詮釋角度，也大致貼近我們對當時社會反應的理解。

沃考維茲的分析自有其重要的地位，對維多利亞社會的性別與階級也有重要的貢獻，但是對開膛手凶案反映出的道德制約卻恐有未盡周延之處。性別的差異當然是開膛手凶案的重要恐懼來源，除此之外，道德制約以及對醫學的想像在開膛手的集體想像中同樣也提供了廣大而深遠的影響力。

同樣討論城市空間與身體意象呈現，還有社會學家桑奈(Richard Sennett)。桑奈分析公共空間在實行集體暴力時產生的中性意義，藉由討論斷頭台的產生過程，說明何以斷頭台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成為處決法王路易十六世的工具，並且將處決法王的集體暴力轉化為「中性的景觀」(neutral spectacle)。斷頭台高效率的處決方式，意味著「人性化處決」的思考已經落實在死刑的執行上，在處決路易十六的安排上，更加顯露出兼顧人性與效率的思考：斷頭台被放置在執行死刑的廣場中央，斷頭台周圍安排了重兵守護，一層一層的衛兵背對著斷頭台，視線一致對著廣場上的群眾。在層層護衛戒備下，公開處決的過程是遭到視線阻隔的。然而，儘管戒衛的士兵無須直視路易十六的身體，無人需要執刀手刃法王，廣場上的群眾也無人直擊處決的執行，但卻都同時感受到了集體活動的共同參與感(Sennett 1994: 296-298)。公開處決法王的儀式具有宣洩民眾憤恨與執行懲戒的隱含意義，卻也因視線的阻隔而保有一定程度的不在場證明。因為所有在場者的視線阻隔，以及集體參與的共同感受，使得處決國王的心理壓力得以受到化解：儘管在場的所有圍觀民眾與值勤士兵都參與了集體暴力的施行，卻沒有人需要單獨承擔這樣的譴責與壓力。

傅柯(Michel Foucault)對於在公共空間中受到處罰的身體有很深入的討論。傅柯認為公开展示的處刑凌虐建立起一種「處罰的經濟」(economy of punishment)，透過受處罰身體的公开展現與律法刑責的建立，社會樹立一種廣大而滲透於社會各領域的懲罰權力。儘管公開處刑與屍體展示在十九世紀初以人道為名遭到禁絕，在斷頭台與監獄產生之後，對身體的處罰開始有人道與效率的考量，儘管如此，身體依舊成為權力與教化的施行區域，殘酷外顯的權力也開始內化隱蔽(Foucault 1977: 3-31)。在傅柯的分析中，罪犯的身體不論在一開始的

公開場域或是後來遁卻隱忍的私領域，都遭到這套懲戒與規訓原則的制約；道德與律法的紀律透過對身體的控制得以充分落實。在傅柯的討論中，公眾展示的暴力已經化約到私密領域中，展現在空間對身體的管制與教化。

如果將開膛手凶案中的受害者身體放在傅柯討論內化隱蔽的懲戒規訓框架下檢視，我們或許可以看出開膛手魅惑中對於妓女的想像。對照當時倫敦東區的現實社會條件，倫敦的東區在工業革命後都市爆炸性的成長過程中淪為吸納外來移民與貧苦階級的都會貧民窟，在十九世紀的最後20年間，倫敦的東區已經成為貧窮、疾病、犯罪、娼妓的象徵(Keating 1973: 585-586; Hobbs 2004: 136; Fido 1987: 4-6)。娼妓的氾濫也已經讓娼妓成為嚴重的社會議題，成為衛道人士口中「嚴重的社會罪惡」(Walkowitz 1980: 32)，與妓女畫上等號的倫敦東區已經成為民眾口中「罪惡的區域」(Glinert 2005: 162)。在這樣的道德想像中，妓女、疾病傳染以及道德墮落產生緊密的連結，妓女的身體也因此成為處罰經濟亟欲管束的私密領域。

桑奈的理論很能夠解釋群眾暴力的集體心態，那是一種宣洩憤恨卻無需直接承擔責任的集體情緒轉移。在近代人類歷史理性與人道思維的運作下，瑪莉·凱麗遭到支解的身體是與時代精神的演進背道而馳的。根據傅柯的說法，直擊身體遭受支解的暴力施行逐漸變成罕見的景象，在歐洲執行許久的公開處決儀式到了十九世紀初即已逐漸絕跡，也因此，《開膛手》在某種程度上重現了公開處決的儀式。尤其影片中大量鋪陳受害者慘遭切割的身體形象，提供了更為寬廣的想像空間，開膛手刀下支解的身體喚回了公開處刑的古老記憶。由《開膛手》所呈現的開膛手針對妓女身體的公開處刑意涵觀之，某種程度上《開膛手》呼應了傅柯所言空間管束的論點，但卻也吊詭地在公開處刑凌虐的儀式絕跡之後，在電影螢幕上重現了公開處刑的想像，這樣的想像再現幾無異於再度執行公開處決。

就這樣的角度看來，開膛手殺戮倫敦東區妓女自有道德教化、公開處罰以及性別暴力等多重混雜的魅惑。當代觀眾已經感受不到沃考維茲筆下十九世紀末的性別暴力，也無法體會傅柯討論十八世紀末至

十九世紀初公開刑罰的消失與律法的建立，但是當代觀眾在欣賞開膛手電影的時候，在目睹素行不良的東區妓女遭受開膛剖腹的極刑處置之後，還是可以感受到公開處決的殘暴視覺刺激與隱約傳達的道德警示。透過影像的再製，消失的公開處決陰魂再現，開膛手透過螢幕傳播再度執行公開處決，百年前的血案在螢幕上重演，而觀眾也從螢幕參與這場公開處決，成為圍觀的目擊群眾，而血腥的身體肢骸，則成為一種觀看的「景觀」。加入圍觀的觀眾不但自己的身體遭到內化隱蔽的規訓教化，在集體觀賞的過程中也因為身處抽離的觀賞位置而獲得無責的中性化地位。

四、解剖醫學與理性規訓

在西方醫學的發展史中，人體解剖長久以來即是引發眾多爭議的禁忌話題。本文藉由討論醫學史中解剖學的發展，比對電影《開膛手》的醫療想像，企圖挖掘開膛手電影中呈現的醫療想像，以及醫療想像所隱含的理性思維與知識體系的建立。本文在此部分關切的核心問題為：電影何以刻意將公開處決與大體解剖作了連結，目的為何？連結的基礎何在？何以遭受解剖的身體在歐洲醫學史的脈絡中幾乎等同於遭受懲罰的身體？更重要的是，這樣的連結建立在什麼樣的醫療想像之上？在《開膛手》的人體解剖再現想像中，解剖醫學又具有什麼樣的意涵？此處所要比對的討論層次有三，首先是由執行解剖的儀式比對解剖醫學傳承脈絡中具有階級區隔的意涵；其次是從解剖發展的歷史事實，探究屍體所代表遭受延長凌虐的意義；最後是探究解剖醫療與藝術創作互文激盪所延續解剖的神秘意涵。在上述三個層次的解剖想像交互作用下，醫學解剖所隱具的理性規訓功能得以在《開膛手》的影像呈現中獲得深化與強化。

西方醫學所賴以為基礎的解剖學，咸認為由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460-377 BC)¹⁵以及蓋倫(Galen, 129-216 AD)¹⁶兩位解剖學家建立理論。兩位建立解剖理論的大師分別在希臘、羅馬，透過大量的人體與活體動物解剖，並藉由比對人體與猿猴的解剖研究，建立人體解剖的理論基礎。縱論希波克拉底與蓋倫的具體貢獻，在於清楚建立疾病與身體部位系統性的關連及其位階劃分(Castiglioni 2003: 120-122, 172-179)。希波克拉底與蓋倫所肇建的醫學體系，所賴以運作的基本動力就是西方文明理性所重視的邏輯歸納法則，在醫學體系中，任何一個身體器官都可以依據功能與位置找到分類的依據，並在邏輯歸納之後，在位階分明的身體體系中找到適合的位置。巧合的

15 希波克拉底誕生於希臘，自小因家學淵源習醫濟世，其著作全集討論範圍廣博，現代醫學教育恪守的醫學倫理也是在希波克拉底撰寫的醫師誓詞中獲得確立，也經常被醫學史家尊為醫學之父(Castiglioni 2003: 115-118; Margotta 2004: 32-35; Porter 2002: 25-31)。然而，關於希波克拉底究竟完整保留多少的解剖著作，一直是醫學史界一個重要的爭議。有論者認為希波克拉底關於解剖學的重大著作早已佚失，現存史料頂多只能看到後人對他的討論，他的解剖學著作並無法正式列入嚴謹的學術討論，也因此，希波克拉底對解剖學的貢獻「可以略過不談」(Cunningham 1997: 10)。也有學者認為無論希波克拉底現存多少著作，或是現存作品是否為希氏原著作品，就醫學發展的進程來說，他對西方醫學的影響力依舊無法抹煞：「希波克拉底就像是個黑洞，深不可測，無法預料，他散發龐大的引力，塑造了西方醫學的樣貌，也帶動了整個醫學系譜的發展」(Miles 2004: 30)。部分學者認為，雖然希波克拉底的詳細身世已不可考，但就十九世紀流傳的希波克拉底作品全集來看，至少留有《人體的構造》(*Places in Man*)、《腺體的構造》(*General Nature of Glands*)、《肌肉的構造》(*Fleshes*)等10本著作，這3本著作被醫界認為是系統脈絡相當嚴謹的著作，當中有相當篇幅直接討論解剖學的發現(Miles 2004: 29; Craik 1998: 1, 12, 32, 39-45)。本文採用現今醫學界大部分遵循的論點，認為希波克拉底為現代西方醫學之父，而他對於解剖學的見解奠定了後代研究的基礎。

16 醫療史學者咸認蓋倫為遵循希臘醫療傳統中最後卻也是最重要的一位，蓋倫的事業重心主要在羅馬，他的理論基礎建立在大量的人體與動物解剖，為了徹底瞭解身體器官之間系統化的運作，以及個別器官的獨立功能，蓋倫進行大量的活體動物解剖用以比對人體器官的運作。蓋倫的解剖理論受到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哲學理論的影響，享有醫學界亞里斯多德的美譽。與希波克拉底不同的是，蓋倫留下大量的著作，這些質量均優的著作成為文藝復興解剖學研究最重要的理論基礎。蓋倫為解剖學建立深遠的貢獻，並且確認解剖的知識是醫學研究的基礎認知，這樣的觀念影響後代醫學研究甚鉅(Cunningham 1997: 25-33, 81-84; Singer 1999: xv-xxiv, 1-12; Richardson 2000: 31-32)。

是，不僅是身體器官可以在體系中找到適合的位階，就連從事醫療工作的人都可以在系統中找尋到自己的位置。儘管希波克拉底與蓋倫在後代的解剖學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大體解剖研究在當時並沒有獲得學界足夠的重視，當時的醫師在臨床診斷之外對於解剖研究並沒有付出該有的重視，這個時期的醫療發展因此建立了幾世紀以來重診療輕病理解剖的醫療傳統：從這個時期開始，醫學界中地位較高的內科醫師(physician)並不屑從事解剖，更不願意花費心力在屍體樣本的病理學研究上，實際的解剖與病理學研究僅由地位較低的外科醫師(surgeon)或是侍役進行(Castiglioni 2003: 280-281; Nutton 1996: 66)。即使是在解剖進行的過程中，垂直堆疊的權力關係依舊是醫學研究運作所需遵循的法則。在一般的解剖過程中，會由教授或資深醫師擔任講解與發號施令的工作，在教授發號施令的同時，會有助理隨即朗讀教材中相關規定與解剖流程，以便提醒在場所有觀眾即將進行的課程，解剖程序由位階較低的外科醫師操刀進行，依照指示按部就班地進行解剖程序，而更多新進的醫師與學生、甚至是花錢進場的好奇民眾則是在旁觀看學習(Richardson 2000: 42-45; Kemp and Wallace 2000: 23)。總論本時期的解剖醫學發展，不論是內外科醫師之間的權力關係，乃至實際解剖操刀過程中的從屬位階區隔，這時期的醫療體系建立在垂直的權力位階架構上。

《開膛手》的開膛手影像呈現，某種程度即承襲了這套醫學體系賴以運作的位階劃分法則。本片採用開膛手即是御醫的皇室涉案論，在影片開頭就定下醫學想像冷峻的基調。與亞伯特王子私通的民女安·庫克(Ann Crook)，在遭到特警隊拘禁之後，隨即送到秘密醫療機構由當時倫敦外科手術最精湛的年輕醫師進行腦前葉移除手術，手術台圍繞著旁觀的醫師與學生，病人在被藥物迷昏之後，隨即被五花大綁送入手術室：

我們在頭頂這樣敲上一刀……在左邊也敲上一刀……右邊也補上一刀……這樣一來，這個可憐又不幸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就再也不用受到病魔摧殘了。多虧現在有這麼簡單的手術，我們可以使這個可憐小女生永久脫離苦痛。

影片的畫面此刻呈現的是高爾醫師帶領著一群資深醫師在解剖教

室的高處包廂中觀看，在影片的呈現中，俯瞰手術進行的高爾醫師占據了手術室中權力架構的頂峰，由他低沈的旁白進行解說與指導；在權力位階中層的是操刀的年輕醫師，電影將這名年輕醫師設定為醫界備受矚目的明日之星，他的動作跟隨著高爾的旁白進行，權力傳承的意味相當濃厚。其次是鏡頭遠處帶入層層圍觀的醫師與助理，專心注視手術台上進行的腦前葉切除手術。位於權力位階最底層的是遭受藥物迷昏的民女，她必須隻身一人面對這層層架構的龐大醫療架構，絲毫沒有任何抵抗或閃躲的機會。

這個介於處決與醫療的公開儀式為緊接而來的開膛手連續殺人凶案張羅一定的神秘想像。這一幕鋪陳醫療手術的儀式大抵呈現出醫學體系中階級分明的元素，以及在階級劃分下，高位階者對於低下位階者的權力宰制關係。比對現存紀錄解剖研究的史料，這一幕所描述的正是醫療體系中層層堆疊的垂直權力關係。這樣的權力位階可以在科森(Johannes de Ketham)著作的《醫學彙編》(*Fasciculus de Medicina*)以及當時許多繪製醫學解剖的圖片中找到佐證，科森的著作中最有名也最經常為後代討論醫學史時引用的插圖〈解剖課〉(*The Anatomy Lesson*)相當露骨地呈現權力的位階關係：位於畫面最上方的是坐在講台上的教授，教授華麗的服飾穿著明顯與下方的見習醫師不同，兩手的姿勢像是在對台下的學生進行解說。畫面中央站在地面上的是見習醫師，畫面最中央上半身微傾在解剖大台的是負責操刀的外科醫師，這位外科醫師右手持刀，比對著躺在畫面最下方的屍體，刀鋒對著屍體胸口一副蓄勢待發的姿態。畫面呈現上、中、下三個層次的空間位階，代表著層層建構的權力關係，儘管解剖室中三個層次的權力架構大多僅存於早期的解剖教學，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這個權力架構受到簡化，操刀者經常也要負起講授的任務，不過解剖過程上層（講解者、操刀者）對下層（見習者、解剖屍體）的權力關係依舊鞏固。在這樣的權力架構中，位於最高階的資深醫師高高在上，意氣風發地發號施令；執行手術的年輕醫師儘管嶄露頭角，在這個醫學體系中卻只能屈就於次等的位階，聽從上級的指示執行命令。更多的新進醫師還只能專注圍觀見習，連操刀解剖的資格都不具備。而在權力階級架構底層的病

人只能無助地被綁在手術台上，接受權力與知識的宰制。在這一幕呈現階級關係的手術景象中，醫學在面對可能鬆動帝國統治基礎的民女時，理性歸納的醫學專業能力轉化為捍衛帝國尊嚴的動能，在精準冷靜的操刀與嚴肅權威的旁白解說中，旁聽席中代表理性與權力的醫師團團圍住威脅理性運作的動亂根源，目睹滴血未濺的最新醫療技術。

除了權力架構的空間呈現之外，《開膛手》所要連結的還有醫學史中屍體在解剖過程中隱含的延長凌虐意涵。在電影中，瑪莉·凱



圖1：〈解剖課〉，摘錄於1493年由科森著作的《醫學彙編》當中的版畫，作品呈現當時解剖課進行的景象，解剖教室具體呈現由上而下的垂直權力關係。

麗遭受處決的場景設定趨近於桑奈所謂的「中性的景觀」場域。影片採用跳接手法呈現瑪莉·凱麗遭受處決的場景，劇情在破落的出租房間與醫學院的大體解剖講堂之間來回跳動承接，除了呼應高爾醫師瘋狂失心的紊亂，某個程度上也刻意藉由畫面來回跳接，將處決瑪莉·凱麗的場面連結到醫學解剖的場域。這一幕血腥的處決畫面在這樣的連結下，衍生出更饒富醫學典故的寓意，遭到切割的身體也因此有了承接暴力凌虐之外的文化意涵。影像在來回跳躍中重現醫學解剖的場景，這樣的空間設定要呈現的即是醫學解剖中制式的場景，而影像企圖連結的元素，自然也只能是專屬於這個場域的隱喻意涵：解剖教室中央是視覺注視的焦點，這裡擺置了解剖大台作為場景設定的核心元素，大台旁坐著圍觀的高階醫師，教室的更外圍是一圈又一圈的階梯式學生座位，講堂裡坐滿了前來觀賞大體解剖的醫師或醫學院學生。在高爾醫師的幻想中，他並非在倫敦東區供妓女暫住的破落小套房執行屠殺，他是在醫學院的大體解剖教室支解瑪莉·凱麗的身體，同時也對著滿座觀眾示範他御醫級的解剖刀法。完成示範之後，高爾起身接受全場醫師起立鼓掌致意，高爾醫師雙手相握，微笑回報全場的聽眾，嘴裡嚷著：「這真是藝術呀！」

很明顯地，電影大量使用醫普詞彙以及大體解剖台的場景設定絕對不是隨性之作，電影除了藉由聲音顫抖的高爾醫師營造瘋狂的殺戮氣氛，更藉由連結解剖場景空間的再現，將殘暴的兇殺案與解剖醫學長久以來具有的神秘與恐懼作了連結。神秘以及恐懼的根源，部分來自屍體在解剖過程中扮演的地位，以及傳達的預設意涵。比對醫學研究發展以及文化史發展出對於解剖的觀念，死去的身體在解剖過程中不僅是知識探索的對象，同時也具有視覺景觀以及延長凌虐的雙重理性規訓意涵。

在這個層次的醫療想像中，遭受切割的身體占有核心的位置。西方解剖醫學在希波克拉底與蓋倫建立理論基礎後，不論在實際操作與理論研究上都遭受頓挫。在基督教文明興起後，宗教信仰產生的禁忌成了壓抑解剖學持續發展最主要的阻力。基督教信仰中強調上帝造人的信仰，人體的解剖被視為「不人道」，並在宗教領袖的宣導下被

視爲褻瀆上帝的禁忌，認爲解剖是對上帝創造出的人體不敬，人體解剖已經成爲社會上普遍認知的一門禁忌，也因此原本就稀少的解剖用屍體就更難取得。¹⁷解剖的研究轉而針對動物進行，解剖學因此成爲「討論解剖而不進行解剖」的研究。解剖學因而從古希臘羅馬到文藝復興這段期間成爲「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的一門研究，就算偶爾進行人體解剖，目的也是爲了彰顯並「展示」上帝創造人類的偉大，而不是爲了醫學的研究。也因此，人體解剖的研究發展在這段期間受到相當大的阻礙，解剖學研究也因此趨於沒落，一直要到文藝復興醫界才重燃對人體解剖研究的興趣(Cunningham 1997: 37-46)。

解剖研究受到的反挫不只來自宗教界的禁制與打壓，學術殿堂的忽略與限制也使得解剖在學術發展的路途中備受干擾。儘管大體解剖在希波克拉底與蓋倫的努力之後已經自成一套嚴謹艱深的學術理論，但是卻一直到了十三世紀才得以獲准進入大學殿堂進行正式而公開的解剖操作與教學。儘管如此，解剖醫學在進入大學殿堂之後依舊受到許多限制。¹⁸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的醫學發展導致日後病理解剖的污名化：從十三世紀大學正式教授大體解剖開始，提供解剖使用的屍體來源一直是民眾恐懼嫌惡的主因：解剖用的屍體最大宗的供應來源是已經被處決的死刑犯，犯人的屍體在死刑執行完畢之後，直接從刑場運送到大學或醫院的解剖教室，繼續接受教授與醫學生的解剖利刃切割。解剖用屍體被視爲法律懲罰的延續意涵一直伴隨著醫學研究的發展，以英國爲例，在1752年明確訂定《謀殺法案》(*Murder Act*)之

17 解剖用屍體來源稀少，一直是西方發展解剖醫學的一大限制，作爲醫療解剖使用的屍體來源一直稀少，也因此經常傳出盜挖墳墓搶奪屍體的謠言。一直到了十五世紀末羅馬教皇才頒佈命令核准屍體解剖在醫學研究上的用途 (Castiglioni 2003: 281, 308; Porter 2002: 53; Ackerknecht 1982: 103-105, 125)。

18 第一具由大學進行的大體解剖發生於1281年，第一具的女性大體解剖發生於1312年，後來因爲刑事偵察的需要，學界開始理解到解剖的重要，歐洲各國才在十五世紀建立專爲教學使用的解剖教室，但是仍有許多的規定，例如巴黎大學規定一年只能進行4具大體解剖，而大體產生的腐臭令人難以忍受，後來也將大體解剖的教學移至冬天舉行，以減少屍體腐臭 (Castiglioni 2003: 281)。

後，將屍體解剖視為刑罰的精神在法令上找到明確的依據，當時的法令明確公布，將屍體解剖視為刑罰的一部分：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謀殺犯都不得入土安葬；殺人犯毫無用處的屍體必須緊接著用於解剖切割；每一位法官與司法人員都需要知道，在死刑執行完畢後，屍體的處理途徑有拋棄、解剖以及懸吊示眾等方式，與現今處置重大惡行的方式相同。（轉引自Sawday 1995：55）

就這個角度分析，解剖用的屍體帶有道德敗壞的原罪，屍體的來源必定來自無法寬恕的罪行。就實際案例來看，解剖也成為法律懲罰惡人的選項之一。也因此，解剖被認定為「法律制訂的一種刑罰，是一種投射了情緒憤慨的刑罰，比起死亡本身還糟糕」（Richardson 2000: 32）。由此看來，大體解剖施加於死刑犯的苦痛顯然有延長處罰的意味，解剖成爲一種處罰的方式，帶來的恐懼甚至比起死亡還來得震撼，而這層延長處罰的意涵也加深了大體解剖在民眾心中的迷思與魅惑。相對地，執行解剖任務的醫療人士也在這樣的醫療想像中，被賦予象徵性倫理道德與社會秩序的整建任務。

除了死刑犯的屍體之外，解剖用屍體另一個大宗來自盜挖墳墓搶奪屍體。就這個管道取得的屍體依舊承載著負面的道德意涵。造就搶奪屍體的起因部分來自合法取得的來源稀少，英國在十六世紀中期每年只提供6具死刑犯的屍體作為解剖使用(Richardson 2000: 52)。由於屍體來源取得不易，研究者經常需要以高價購買經由非法途徑而來的屍體，在經濟的誘因驅動下，各種以搶奪、盜墓、偷竊途徑而來的屍體成爲地下經濟交易的商品。以英國爲例，自十七世紀後半葉起，屍體成爲買賣的商品，屍體的買賣甚至產生市場交易的行情價碼，而盜墓竊取屍體的傳言也屢見不鮮(Richardson 2000: 53-58)。除了盜墓，剛過世尚未埋葬的「新鮮」屍體在解剖圈中可以賣到更高的價碼，因此也產生搶奪屍體的案例，英國許多地方爲了保衛親人屍體免於爲人搶奪販賣而徹夜守候親人的遺體，還因此衍生發展出守靈的習俗(Richardson 2000: 22-26)。

對於解剖醫學的發展，醫學界從一開始的熱情研究，轉而冷卻避諱，甚至到了文藝復興之後重新燃起興趣，在態度上確實有相當劇

烈的轉折。就整體醫學觀念發展來說，解剖醫學在西方醫學歷經過大起大落的變化，曾經一度原地踏步，也歷經來自國家機器的壓抑。然而，儘管解剖在醫療史的發展脈絡中有複雜的意涵，對於屍體的來源以及解剖屍體隱含的道德懲戒暗示，卻具有相當高度的一致性：從十三世紀近代醫學的發軔起算，西方醫療史對於解剖台上的冰冷屍體總是抱有高度的道德譴責的負面意涵：譴責基督教的信仰理念使得人體的醫學解剖成爲禁忌，加上學術圈的消極限制，解剖成爲律法制裁的延伸，象徵延長懲戒的解剖大體必須無止盡地承擔身體上的懲罰，加上時有盜墓取屍的驚悚傳聞流傳，使得解剖用屍體所背負的污名始終難以去除。

解剖元素在《開膛手》中隱具的第三個層次的意涵，來自於解剖醫療與藝術創作激盪所衍生的互文交錯。電影中多次出現層層環繞解剖大台的階梯教室以及解剖台周邊圍觀的醫師，以及這個權力空間中不同位階的視覺互動，是這一層次理解意涵的構成要素，這樣的場景設定在西方醫學史上具有特殊的意涵，也在西方藝術史上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從十七世紀起，醫療解剖的場景成爲許多歐洲藝術家喜愛採用的素材，醫學解剖實景成爲藝術創作的靈感來源，以解剖爲題的藝術創作也爲詮釋醫學解剖注入豐富的創作啓發來源。而醫療與藝術創作之間相互啓發的互動，也在《開膛手》的影像呈現中有著意圖明顯的描繪。

在文藝復興思潮帶動下，解剖用的人體也開始展現視覺呈現的潛力，解剖台上的屍體開始成爲一種觀看的「景觀」。解剖用的屍體由禁忌轉換爲觀賞的「景觀」，觀念轉換的關鍵人物是帶動解剖研究復甦、被尊爲西方解剖學之父的維薩琉斯(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¹⁹維薩琉斯的具體貢獻除了發表大量關於解剖的著作，

19 維薩琉斯被視爲文藝復興時期重振解剖研究最重要的學者，他強調要以實驗與觀察的科學精神投入解剖研究，強調親手操作與細心觀察的實驗結果比起遵循權威與傳統來得重要，某種程度上維薩琉斯重振了蓋倫打下的解剖研究基礎，但同時也推翻了蓋倫建立的解剖理論，被譽爲「第二位蓋倫」(Cunningham 1997: 88-128)。

這些研究著作也奠定了現代西方解剖醫學發展的基礎，此外，維薩琉斯還透過打造有效率的教學空間，大量並且有效率地教育大量的醫療專業人員。根據波特的分析，維薩琉斯對於解剖學的偉大貢獻在於他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研究氣氛，自維薩琉斯以降，「將解剖學的研究基礎建立在透過觀察而得到的事實」(Porter 1996a: 137)。維薩琉斯尋求大量並有效益地傳授「觀察」解剖學的科學方法，他的解決之道來自於教學空間的改造，這個空間改造的核心理念在於讓解剖的屍體得以進入觀看景觀的中心，而眾多觀看者的視線卻不至於遭到阻擋。維薩琉斯強調的醫學解剖教育相當重視視覺的呈現，他認為習醫者需要有「視覺思考」的能力(Cunningham 1997: 111-115)，在這樣的邏輯下，維薩琉斯規劃出層層圍繞的觀眾席，由擺置於中心的平台為圓心，周邊逐層搭建漸漸高起的觀眾席，後排的觀眾視線不會受到前排觀眾的干擾，而擺置於中心點的解剖台理所當然地成為所有觀眾的共同視覺聚焦點。維薩琉斯據此理念打造出可容納150位醫師見習的「解剖劇場」(anatomical theater)，此劇場空間呈現的各種考量都是為了「儀式」進行的便利，而作為「劇場」空間該具備的元素也不能缺少：現身劇場中央的是劇場主角，也就是維薩琉斯本人，他專注的從事解剖示範是最精彩的表演，環環相繞的見習醫師是劇場的觀眾，而解剖台上的屍體就是戲劇呈現中不可或缺的道具(Richardson 2000: 65-73, 126-131)。「解剖劇場」的硬體建築逐漸成為歐陸大城市仿效跟進的建構原形，劇場中的空間權力架構在對一般民眾開放之後更獲得強化，以當時歐陸解剖研究重鎮的荷蘭大學城萊頓(Leiden)為例，萊頓成立的解剖劇場在對外開放之後，不僅以人體解剖為吸引觀眾入場的重點，更在空間配置上加上多種動物解剖作為噱頭，解剖劇場的天花板與牆壁上垂掛著多種動物的骨架標本，在觀眾席中也會擺設人體骨架模型。進場的好奇觀眾人數眾多，因此讓解剖劇場呈現「歡愉喧鬧的嘉年華氣氛」(Kemp and Wallace 2000: 24)。

前述有關醫療權力位階的排序、屍體隱含的刑罰意涵、解剖教室的劇場空間呈現，相互激盪出具有多層次意涵的符碼。然而，解剖符碼的多重意義不只在醫療領域內激盪，也經常跨越不同的文類造就出

豐富的互文內涵，這樣的互文性主要呈現於西方繪畫，自文藝復興時期起，持續交錯激盪出精彩的藝術作品。

解剖成爲西方藝術家畫布上經常出現的題材，主要的關鍵因素來自於觀念的轉換：人體開始擺脫宗教的禁忌成爲頌揚的對象。人體解剖的禁忌觀念在文藝復興時期面臨新思潮的挑戰，這個時期的主流思潮針對個人的意義與價值進行檢視，認爲人體是人類思想的中心，崇拜人體美的傳統獲得復興，對人體的歌詠才開始重新大量出現在文學與藝術作品中(Castiglioni 2003: 354-365)。在文藝復興之後，對於解剖知識的追求也瀰漫於藝文界的創作中，解剖學所開發的人體結構成爲從事繪畫藝術必須精通的知識。醫療解剖也開始與藝術創作產生連結，成爲西方繪畫創作熱衷採用的題材。²⁰以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爲例，他就爲了藝術創作而投入解剖的研究，不但親自解剖人體，甚至還發表研究解剖的論文。²¹此外，解剖的研究成果往往也需要藝術家的合作方能鉅細靡遺地忠實以畫筆紀錄。以維薩琉斯爲例，他長期與荷蘭藝術家卡爾卡(Jan Stephan van Calcar)合作，由維薩琉斯進行解剖，卡爾卡將解剖的成果鉅細靡遺地以圖像紀錄成書(Kemp and Wallace 2000: 13)。解剖醫師與藝術家兩方相互依存、彼此合作、因而互蒙其利，解剖與藝術的共生互利關係因而從文藝復興時期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中期(Kemp and Wallace 2000: 16)。

藝術創作對解剖題材的喜愛與互利結構在十七世紀依舊蓬勃發展，這個時期出現許多以解剖爲題材的藝術作品，這些作品所繪製的醫療解剖「劇場」空間，則開始強化醫療解剖具有道德懲戒與權力宰

20 文藝復興引燃對人體的熱愛與發源地義大利有很大的關連。而義大利成爲文藝復興時期研究大體解剖的重鎮，跟義大利屍體來源相對容易取得有關，義大利對於醫學用途的屍體解剖予以政策上的鼓勵，研究者甚至可以因應不同的研究目的，指定死囚處死的方式與保全醫療解剖的身體部位(Castiglioni 2003: 365)。

21 達文西對解剖學曾經親自細心研究，他不但留有細心描繪身體骨骼與肌肉系統的手稿，更曾親自解剖過30個不同年齡的男女，並且發表大量解剖論文。只不過當時世人的目光放在達文西的藝術創作，並未重視他在解剖學上的貢獻(Castiglioni 2003: 347-353; Van de Graaff 2002: 13-14)。

制的意涵。荷蘭畫家林布蘭(P. Rembrandt van Rijn)有多幅以大體解剖為主題的畫作，當中以創作於1632年的《杜爾普醫師的解剖課》(*The Anatomy of Dr. Tulp*)以及1656年的《德曼醫師的解剖課》(*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Joan Deyman*)最經常受到討論。這兩幅畫中執行解剖的醫師都是當代名醫，畫面的構圖強調醫師對於解剖屍體以及醫學專業全盤掌控的信心與權力，兩幅作品均將解剖流程放置在林布蘭擅長處理的陰暗光線下，同樣呈現陰森詭異的氣氛。

在《杜爾普醫師的解剖課》畫中遭到解剖的死刑犯被擺置於畫布中央，慘白的軀體加上光線的投射愈發成為視覺集中的焦點，擱置於畫布右端是進行解剖的醫師，醫師充滿權威的手勢與篤定的眼神，對照於死囚遭受解剖刀切割後暴露的手部肌肉紋理，醫師對於死刑犯屍體的宰制關係不言可喻。畫布的左端是7名學習的醫師，眼神專注地盯著解剖過程，死囚的身體在尋求知識的眼神關注下反覆被檢視切割。《德曼醫師的解剖課》同樣強烈傳達身體遭到處罰的視覺震撼，



圖2：《杜爾普醫師的解剖課》(1632)，原畫尺寸 216 x 170 cm，典藏於荷蘭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 Royal Picture Gallery)。



圖3：《德曼醫師的解剖課》(1656)，原畫尺寸100 x 134 cm，典藏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

德曼醫師是前述畫作中杜爾普醫師的得意門生。根據沙帝(Jonathan Sawday)的分析，現存的畫作僅是原畫作中殘存的一部分，遭到腦部解剖的死刑犯是位名為喬立斯·方騰(Joris Fonteyn)的竊賊，屍體在執行絞刑完畢之後被送到德曼醫師的解剖室，由德曼醫師進行解剖，阿姆斯特丹外科醫師公會的8位年輕醫師在一旁見習。現存的畫作中只留下遭受解剖的犯人全身清楚可見，執行解剖的德曼醫師只見執行解剖的雙手，以及在一旁端著醫療容器的助理。相較於《杜爾普醫師的解剖課》中囚犯僅有左手臂肌肉剝離，此畫的死囚遭受腹腔與頭顱的解剖伺候，白布未能遮掩的上腹部只看得到掏空的腹腔，頭顱甚至被切開，頭皮外翻，直接呈現在觀眾視線的是血淋淋的腦部。

這兩幅畫作不僅是藝術創作，也不只是將人體解剖置入畫作，在解剖人體的細節上也有忠實的呈現。林布蘭的畫作呈現有相當紮實的醫療理論基礎，他的創作依據維薩琉斯的解剖著作《論人體的構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繪製，在人體器官的細節呈現相當忠實且細

賦：《杜爾普醫師的解剖課》對於手部的肌腱與神經分佈相當忠實，對照維薩琉斯一幅半身雕刻畫像中講解解剖屍體手部肌腱與神經的呈現，兩幅畫之間有著相當明顯的互文交流(Kemp and Wallace 2000: 25-28)；而《德曼醫師的解剖課》則是凸顯腦部的解剖。除了人體結構細節的呈現，畫面的呈現也非常忠於維薩琉斯制訂的解剖程序，在除去頭蓋骨之後，屍體露出的是大腦兩個腦半球，接下來的解剖程序就是要「用手直接撥開兩個腦半球，接著要直接探入腦部中央」(Sawday 1995: 154-155)。

人體創作作為藝術創作持續熱愛的題材，從達文西、林布蘭之後，十八世紀中葉的英國畫家霍嘉斯(William Hogarth)的畫作中更是強調人體解剖的殘酷。霍嘉斯最具知名度的畫作《殘酷的回報》(*The Reward of Cruelty*)是相當具代表性的雕版畫作，霍嘉斯從畫作名稱到畫面呈現，對於解剖具有的冷酷與殘暴有著相當露骨的呈現。霍嘉斯這一系列最有名的四連畫《殘酷的四個階段》(*The Four Stages of Cruelty*)所呈現的是死刑犯一生的故事，由四張畫作連續描述死刑犯由小至大墮落的一生，前兩幅畫作畫的是自小虐待動物的小惡行，成人後淪落至第3幅呈現犯下的誘姦與殺人死罪。《殘酷的回報》是第4幅也是最後一幅畫作，描述的是這名死刑犯人生的最後寫照，他在執行完死刑之後，屍體被送往公開解剖。在霍嘉斯的畫作中，高高在上的教授以傲慢的眼神俯視解剖的進行，解剖台上的屍體同時遭到3名外科醫師的解剖，畫面中央的醫師手握尖刀，持刀的手臂肌肉線條相當突出，對照屍體敞開的腹部，可以看出劃破腹腔切割身體除了需要深奧的醫學知識，還要有強大的力道方能隨意施展精密的刀法。屍體的腹腔開啟，腸子外露從解剖台上一直蔓延垂到地面，一路延伸的腸子盡頭處有頭小狗，這隻狗正張口咬舐丟棄在地板上的肝臟。畫面的左下角擺放著一個鍋子，鍋子裡浮現3顆頭顱骨以及幾根隱約可見的大腿骨，鍋爐底部還看得到旺盛的大火烹煮。畫面右邊的元素同樣呈現出殘酷的肢體撕裂，解剖大台上的屍體脖子上清楚可見環繞著屍體頸部的麻繩，顯然屍體來自於絞刑刑場。畫面右邊一位外科醫師左手捧起屍體的頭部，右手持刀挖掘屍體的眼睛，刀身也已經大半沒入屍體的眼窩中，而動手解剖的醫師卻是面露笑容。畫面最左邊一位看來更為年輕

的外科醫師手持手術刀，眼神專注地正在切割屍體的腳踝。比起林布蘭畫作中醫師以知識權威宰制解剖屍體的呈現，霍嘉斯的畫面則是以露骨的方式強化醫學知識施加於解剖屍體的殘暴與傲慢。

影片《開膛手》企圖連結林布蘭與霍嘉斯畫作的醫學元素，在一幕描述開膛手作案前的準備工作中可以窺見一二。在描述開膛手出門前的準備工作時，電影選擇以拍攝居家擺設的方式來呼應開膛手的醫師身分以及殘暴的性格。電影畫面先是近距離拍攝代表悠閒生活的唱片喇叭，接著畫面轉移到餐桌上兩片帶著鮮血的牛肉，接著是持餐刀切割肉片進食。之後畫面帶入掛置在牆面上兩幅描繪顏面畸形的病人畫作，在開膛手從容地準備好解剖工具出門作案之際，畫面停留在懸掛在牆上的一幅畫。影片中牆上畫作的內容與構圖明顯模仿霍嘉斯的《殘酷的回報》，畫面中同樣的是由醫師持刀挖掘屍體眼窩，屍體表情同樣顯露出極度的恐懼與痛苦。



圖4：英國畫家霍嘉斯《殘酷的回報》(1751)。在當時的英國，霍嘉斯的版畫經常出現在廉價的出版品中，大量曝光的結果使得霍嘉斯的聲名大漲，但也因此使得這一系列的版畫出現許多複製品。

將《開膛手》的畫面與劇情呈現比對上述名畫，可以看出本片刻意尋求與醫療解剖史、藝術創作連結的意圖。除了將解剖教室的空間以劇場的方式呈現，凸顯解剖者對於屍體的權力宰制關係，也呼應了繪畫中精密呈現的身體構造與解剖醫學互文交流，電影的影像還呼應了解剖研究中屍體反映出的權力支配與知識傲慢的面向。就這方面看來，《開膛手》承襲了醫學尊崇地位的傳統，繼承了自文藝復興至十九世紀藝術與醫學互文的文化意涵：無論是在電影中或是畫作上，醫師都是代表理性、科學、紀律的現代醫學表徵；而遭受解剖的對象，都是某種形式下在死後延長懲罰過程的對象。在林布蘭與霍嘉斯的畫作中，死刑犯身體承受的折磨反映出犯人生前犯下的過失；就《開膛手》的螢幕呈現來說，遭到開膛剖肚的5名妓女，同樣具有道德懲戒的意涵。電影要彰顯的道德懲戒此刻與林布蘭與霍嘉斯畫作中的延長凌虐產生連結：死刑犯的身體以及街頭妓女的身體，同樣都是道德淪喪的表徵，同樣都是污穢骯髒的呈現，自然同樣需要社會道德規範的匡正與處罰。用來體現人道關懷的醫術，此刻成為處決犯人的工具；用以研究醫學的解剖大體，此刻成為道德懲罰的對象。而解剖在被賦予道德懲罰的責任之後，理性的內在思維取代負面的嫌惡與恐懼情緒，成為主導詮釋解剖學意涵的主要觀點。在藝術與醫學的互文交錯過程中，道德位階獲得凸顯，而解剖的處罰經濟也開始納入理性思維的運作，解剖成為延續醫療想像與恐懼的關鍵點，連結知識體系與理性思維的傳承，也成為襄助各項醫療領域與文明進展的推手，進而在十九世紀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思維模式與文化意涵。

依據傅柯對於「可見」(visible)與「未見」(unvisible)知識體系的說法，建立在眼睛視線可見的觀察分析是啟蒙時代以來醫療知識體系建立的基準，醫療知識體系的建立完全依循眼見為憑的臨床實證觀察。然而，自十八世紀末期至十九世紀，解剖醫學的發展卻使得醫療人員的凝視(gaze)開發了一個未曾碰觸的全新醫療領域，隨著病理解剖學的發展，醫學界開始體認到病人外表可見的疾病症狀並無法直接指出未見的病灶根源，這些身體表象下的疾病根源需隨著病理解剖才能看見(Foucault 1973: 131-136)。如此一來，死亡不再是研究病症的終點，透過對於病人死後屍體的挖掘，生命的知識在生命毀滅中找到

起源。如傅柯所說，自此之後，「在死亡之中，疾病與生命得以訴說真實」，而「生命的幽暗於是消解於死亡的清明中」(Foucault 1973: 145-146)。根據傅柯的說法，隨著視覺知識領域的轉換，解剖成爲啓蒙思維的新起點，也爲後續理性思維運作找到了一個全新的切入點。

理性思維介入解剖研究之後，在十九世紀帶動了一連串的醫療發展。十九世紀是近代醫療發展相當關鍵的一個時期，許多對現代醫療有深遠影響力的重大醫療發展都在這個時期發生，這個時期在外科手術、麻醉學、傳染病學、藥理學、病理解剖學、公共衛生、神經醫療、放射醫療等研究領域都有突破性的進步，也因此，十九世紀的醫療發展已經不只建立於個別醫療研究人員的成就之上，而是尋求一種普及化、制度化的科學醫療行爲，建立於十九世紀初期的現代化醫院以及高度專業化分工的醫療科別區隔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象徵(Ackerknecht 1982: 145-146, 194-195)。除了制度的建立，十九世紀臨床醫學中最大的突破來自於病理解剖學的重大發展，由於技術的突破，以往無法解釋的病因在這個時期的病理解剖研究中紛紛找到問題的根源。尤其是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因爲微生物的研究、無菌醫療的發展以及顯微麻醉醫療的突破，使得外科手術在這個時期達到前所未有的成就(Rosen 1993: 270-275; Porter 1996b: 196-202)。根據醫學史專家艾克聶契(Erwin H. Ackerknecht)的說法，到了1880年代，病理解剖成爲近代醫療知識體系建立的重要基礎，醫學技術的發展已經使得外科醫師足以放膽嘗試以往不敢碰觸的醫療領域，諸如人體關節、腹腔、頭部等功能複雜的身體部位已經透過病理解剖學的研究累積到足夠的臨床醫療技術(Ackerknecht 1982: 192)。而病理解剖學在這些重大醫療的突破中，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也是成爲十九世紀醫療知識體系建立的重要推力。名醫畢夏(Marie François Xavier Bichat)甚至講過「好好做幾個解剖的收穫，勝過20年的病症觀察」的名言(轉引自Ackerknecht 1982: 147)，足見解剖對於醫學研究的重大貢獻。

解剖的研究發展還展現了現代性重視效益與追求大眾福祉的能量，而這樣的發展動線依舊是理性思維展現的成果。解剖研究的突破不但幫助了醫療知識體系的建立，也在醫療以外的領域發揮了影響

力，並透過集結醫療領域之外的勢力，強化了解剖醫療的知識體系。維繫英國醫療發展甚為重要的解剖屍體來源，在十九世紀有了重大的改變。傳統中使用死刑犯的屍體作為醫療解剖來源已經供不應求，因應隨著醫療進步而需求量大增的屍體，英國國會在醫界強力的運作下也體認到解剖對於英國醫療發展的重要地位，因此在1832年由國會通過頒佈《解剖法》(*The Anatomy Act*)，由國家機器成為醫療發展的重要推手。根據《解剖法》的規定，充斥倫敦街頭的流浪漢如果在死後沒有親人朋友招領，將被送至醫療機構作為解剖與醫療研究之用(Pickstone 1996: 269)。此法令一舉解決醫療與社會雙重的需求，同時也反映了社會中上階級在制訂法令的過程中對於下層階級的現實思維：街頭流浪漢既然成為帝國發展難堪的社會邊緣人，不但在公共衛生與心理層面成為社會秩序的負擔，倒不如將此負擔轉為正面用途，讓社會的負擔成為推動醫療研究的資源。《解剖法》的推動正是社會中上階層現實思維的具體呈現，成功將城市景觀的毒瘤轉化為推動醫療研究的動力，一舉在社會層面與醫療層面解決兩個迫切的問題。

就某個角度來看，街頭流浪漢成為醫療研究的發展動力，卻也維繫住解剖傳統中的道德懲罰寓意。以往用於解剖的死囚屍體具有延長公開刑罰的意味，到了十九世紀的英國，用於處罰的對象除了危害社會治安的死囚，還加上了影響社會景觀的流浪漢，處罰經濟的規模頓時急遽膨脹，處罰的對象也從無可寬恕的死囚，擴大納入阻礙社會發展的社會底層，處罰經濟的規模在國家機器的保障下獲得擴張，無形中也加強了解剖具有的道德處罰意涵。將原本棄置不用的流浪漢屍體轉換為有利用價值的解剖用屍體，此舉也具體展現醫學結合法律的理性思維務實運作。

也因此，《開膛手》中受害妓女身體慘遭支解的呈現正是醫療知識體系建立的重要關鍵，將開膛手連續殺人命案放置在醫療史發展的脈絡中來看，遭解剖的妓女身體就不只是單純的血腥殺戮，而是連結知識體系脈絡的關鍵要素。就解剖學的發展進程來看，解剖學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建構理論基礎、劃分禁忌規範、樹立懲戒標準、建立法令規章、進行權力塑造，就這個角度來看，解剖醫學的發展本身就

是一門知識體系的建立。在十七世紀時如此，在顯微技術獲得突破之後的十九世紀也是如此，在二十一世紀《開膛手》的影像呈現亦復如此。就開膛手文學的集體想像層面來說，開膛手文學的創作發想過程也是一段知識建立的過程，以電影《開膛手》為例，就可以看出刻意操作與醫療解剖之間的連結，無論在場景的設計、角色的刻畫與看待屍體的眼光，在各方面都看得出來創作者刻意與醫療史知識體系以及藝術史創作典範尋求連結的軌跡。正如前所述，電影《開膛手》反映出開膛手學與解剖醫學一脈相傳的想像脈絡，企圖在二十世紀乃至二十一世紀重新塑造十九世紀末英國社會的醫療想像，並且更深入挖掘自文藝復興起解剖醫學所顯現的權力傲慢與殘暴血腥的面向。由此觀之，無論就個別的電影創作或是集體想像的開膛手文學來說，開膛手學以及開膛手文學都是尋求建立知識體系的嘗試。也因此，開膛手命案中的解剖想像就同時背負著建立知識體系以及強化道德懲戒的雙重意涵了。

五、開膛手的醫師想像

福爾摩斯探案中有句名言：「當一個醫生誤入歧途的時候，他會是最高的罪犯，他具有膽識，同時也具有知識」（轉引自Doyle 2003：321）。放到開膛手的例子中，福爾摩斯的話一語道破開膛手的醫師身分所具有的特殊魅惑。

有關開膛手身分的推論莫衷一是，至今仍無一套具有說服力的說法，²²但是，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也是電影拍攝時最樂意採用的一種說法，就是開膛手傑克是個醫生的推論。這套推論的基本假設在

22 有關各種開膛手身分的目擊證詞莫衷一是，各種說法經常互相矛盾，有從「40歲以上的男子，膚色黝黑」、「年輕的醫學院學生」、「衣衫襤褸的上流紳士」到「外國人」等各種說法。但是從驗屍法醫的說法當中，則有法醫推論開膛手具備基本醫學器官與解剖的知識與能力，也因此許多的開膛手電影把開膛手設定為醫師的身分(Begg 2004: 217-221, 223-242, 305, 340-342; Sugden 2002: 95-96, 102-103, 113-117, 200-208)。

於，能夠如此熟練地支解身體，並且完全沒有發出任何聲響引起住戶的注意，此人理應具有一定程度的醫學專業知識。儘管本案沒有可信的目擊證人，但在案發當時就有一些說法指向開膛手具有醫師的身分，有多份驗屍報告推斷兇手具有解剖屍體的知識，熟知刀刀的操作以及人體器官的構造與相對位置，因此認定兇手要不是手法俐落的屠夫，就是發狂喪智的醫師或是醫學院學生。²³

開膛手傑克真實的身分是誰，或者他到底是不是醫生，他到底不具備醫學解剖的能力，這已經不是可以經由理性辯證而求出結論的歷史公案，然而，在《開膛手》所採納的皇室涉案論所承襲的開膛手推論，開膛手的身分始終與醫師脫離不了關係，開膛手的醫師身分所延展的想像，或許更具有更深刻的文化意涵：重點是，為什麼在開膛手學的想像中，開膛手傑克必須是個醫生？為什麼在電影的呈現中，開膛手手上的刀，會從開刀的手術刀，變成虐殺妓女的凶器？開膛手是個醫師，由他所執行的恐怖殺戮也具有彰顯道德懲罰的寓意，這樣的意涵到底有什麼樣的特殊意義？

莫瑞(Alex Murray)認為開膛手的種種討論反映出西方文明一個存在已久的內在矛盾，也就是「啓蒙的辯證」產生的矛盾。莫瑞認為如果從兇手具有真實身分這樣的角度來看，開膛手這一號人物從來不存在。開膛手真實存在的意義，是「從調查凶案中反映出一件事情——我們自己」(Murray 2004: 52)。過去一百年來的調查，並無法揭露兇手的真實身分，唯一揭露的，是西方社會對人類理性思考的信念。過去一百年來，每隔幾年就有所謂的新事證，就有所謂的破案大公開，但

23 儘管現有的史料證實的確有法醫認定開膛手具有醫學專業能力，也有媒體報導同意這樣的說詞，但是在當時調查命案的時候，醫學的背景並未成為警方重視的一條線索，種種討論也僅限於將開膛手設定為「知道哪些器官長在哪裡」或是「能夠隨心所欲使用刀刀」，有些推論將開膛手鎖定為「獵人、肉販或是屠夫」，也有推論指向猶太人的涉案，將開膛手設定為「具有科學或解剖知識」僅是眾多揣測之一。開膛手一開始的想像並未將之設定為醫師，足以認定開膛手具有的醫師身分也是後來集體想像所演繹衍生的結果(Begg 2004: 193-194, 242-244, 303-304; Sugden 2002: 95-102, 113-208, 220-224, 246-248, 333-338)。

是這些努力僅僅顯示出西方社會對理性思維的樂觀與信仰：凶案不會永遠成爲懸案，「只要依循推理與調查的理性運作，所有的凶案疑雲終將破解」(Murray 2004: 54)。幾百年來秉持著同樣信念的人投入開膛手的研究，所謂理性調查的結果交織成一套開膛手學「啓蒙辯證」的網絡。

引申莫瑞的說法，醫學想像在開膛手學就是「啓蒙辯證」中相當重要的一條脈絡。現代醫學的基礎建立於思想、觀察與研究，科學醫學的興起甚至與希臘哲學同時發展，醫學強調理解、分析、歸納的思辯方式，與哲學的思辯訓練無異：在發展初期，哲學與醫學同樣都強調對自然與人類生活的觀察，甚至最初的醫學家也都具有哲學家的身分，並且認定只要依循正確的方法，一切的自然現象皆有其簡單而可以理解的法則(Castiglioni 2003: 77-80, 92-94, 100)。強調理性思辨的醫學特質是醫學倫理的核心關懷，在希波克拉底肇建的醫學倫理經典著作中，行醫者被要求成爲「哲學家的醫生」，一名優秀的醫師應該具有哲學家的特質，秉持利他主義，熱心助人、謙虛爲懷、外表高貴、判斷冷靜、沈著果斷、生活純樸、虔誠信神。²⁴根據現存希波克拉底制訂的醫師誓詞版本，在培養醫師人才的訓練標準中，就相當強調醫師的智慧以及救人濟世的無私情操：

吾將以純潔與神聖爲懷，終生不渝。……無論何時登堂入室，吾都將以病者安危爲念，遠避不善之舉。無論遇自由人或奴隸，吾都將戒絕濫用職權，或放縱於男女之情。無論所見所聞何事，無論專業或私人之事，都應不予洩漏，吾將嚴守秘密，不予外傳。(轉引自波特 [Porter] 2008: 49)

承襲希波克拉底建構醫學倫理大成的名醫蓋倫，甚至明確要求醫生除了「實務治療的經驗」，也必須是個精於「邏輯推演與倫理規

24 現代醫學講求的醫學倫理也是在希波克拉底撰寫的醫師誓詞中獲得確立，直至今日，所有自醫學院畢業取得醫師資格的學生，都會集體宣示改寫自希波克拉底制訂的醫師誓詞，誓詞內容主要宣示「不可傷人乃爲醫師之天職」之基本信念，召示投身無私從醫的愛心與決心(Castiglioni 2003: 115-118; Margotta 2004: 32-35; Porter 2002: 25-31; Miles 2004: xiii-xiv, 5-8, 35-40)。

範」的專業人士(Porter 2002: 32-35; Margotta 2004: 42-45)。醫學從被當成一門專業學門以來，就取得相當高的道德與理性高度，也因此，醫學專業能力與醫療倫理光環在民眾心中所建立的陌生感與恐懼感，以及醫學作為一套專業知識所具有的理性與紀律，強調精準、熟練的執業要求，以及長久以來醫師被要求冷靜沈著的專業形象，更是加深了對於這套工具理性的信心，使得醫學的想像在納入開膛手學研究的集體想像之後，隨即成為廣大民眾著迷的想像素材，也強化了莫瑞所說的「啓蒙辯證」的內在矛盾。

《開膛手》在開膛手的身影與作案手法的呈現上，相當強調精確與冷靜的醫療專業形象，這樣的理性與嚴謹的冷峻形象不斷在開膛手作案的時候上演。開膛手神秘的皮箱在影片中被仔細檢視，皮箱精緻的做工與皮質，顯示出皮箱所有人的財富與地位；皮箱鑲上的徽章，顯示皮箱擁有人的醫學地位。更駭人的是，在打開皮箱後，各種尺寸與形狀的手術刀排排陳列，在鏡頭前閃閃發亮，更是展現外科醫療的冷峻與嚴肅，陰森的刀光下，手戴白手套的開膛手俐落地取出各式解剖不同身體部位所需的手術刀，在命案現場灰暗的煤氣燈照射下，熟練地使用刀刀，作案過程中不時轉身更換不同的刀刀，顯現出開膛手即便在瘋狂行凶過程中也要堅持在手術房內同樣標準的嚴謹、專業與冷靜。《開膛手》呈現的開膛手媒體形象顯示觀眾對醫學焦慮的投射，也就是，救人生命的人突然變身為取人性命的惡魔，醫師所具有開膛剖腹的能力，此時也轉化為最殘酷的殺人手法。影片中重複呈現開膛手擺滿手術刀的隨身刀具攜帶盒，精緻的手術盒中擺著反射著陰暗路燈的外科手術刀，剪刀、鉗子、針筒以及各種尺寸與形狀的刀具有不同而精確的使用功能，手術刀的展現是醫學作為工具理性最直接的呈現。但是《開膛手》卻也同時強調開膛手作案過程中放任原始狂暴的本能發洩，如此充滿內在矛盾的形象設定，更增加了開膛手身分可以呈現的豐富想像空間。

在影片《開膛手》中，亞伯霖警探與高爾醫師的對話進一步展現開膛手專業的醫療想像。亞伯霖警探此時對於開膛手的案情全無頭緒，完全沒有懷疑御醫的涉案，他謙虛地向御醫提出他的問題：「您認為

這把刀是什麼樣的刀子？」隨即在御醫講課的教室黑板上畫下他夢境中出現的開膛手作案刀，御醫的回答充滿醫學教育的篤定與權威：

我想你要畫的是李斯頓刀(Liston knife)吧。這個刀子以李斯頓命名，他是克里米亞戰爭(the Crimean War)時的軍醫，因為當時戰場上沒有麻醉藥，所以他發明了這種刀子……這種刀子可以用來迅速截肢。

接下來亞伯霖警探向高爾醫師請示屍體的鑑識報告，高爾醫師若有其事地對著驗屍報告低頭沈思，旋即發表他對鑑識報告的想法，同樣具有權威與專業的口吻：

他是由左到右劃過她們喉嚨的。因此，他慣用右手……他必須割開四層的皮層組織……還要切開厚達一吋的皮下脂肪。接下來，他會進入腹腔，所以他所需要的不只是李斯頓刀而已。或許他身上還帶著一個方便攜帶的隨身手術箱，跟這一個差不多。

正當高爾醫師展示他的隨身手術箱，亞伯霖警探接著追問：「您認為兇手受過教育嗎？或者是兇手受過醫學教育？或者是兇手就是個醫生？」高爾醫師的回答依舊充斥醫療權威的口吻與專業術語：

要找到腸子很容易，至於子宮……肝臟……這就很難找了，除非你很清楚知道你要找的是什麼器官。他的動作很俐落，在黑暗中還能這般俐落……我想……我想這個怪獸要不是個獸醫，要不就是毛皮製作工人……要不就是受過特殊訓練的屠夫……要是我的話，我會鎖定懂得人體解剖的人。

對於開膛手的醫學想像在處決瑪莉·凱麗之際達到最高點，影片中大量使用影像與聲音效果中塑造出此幕的兇殘，在大片血漿潑灑與驚悚音效之中，影片旁白浮現一個詭異的聲音：「醫師，請您解釋一下人類的心臟？」開膛手儘管在此時已經陷入瘋狂，他的回覆依舊堅持醫療專業人員的理性與紀律：

人類的心臟……是個組織強韌而有力的肌肉……像是桃花心木一樣的強韌有力……甚至很難燃燒。體積約莫跟拳頭一般大小。提供了全身血液循環的動力。心臟由兩個心房、兩個心室以及四片瓣膜組成。事實上，心臟就是一具幫浦……帶動兩道循環系統的幫浦。一顆成人的心臟大約每分鐘跳躍70到80次。心臟相當地有力……如果人體最大的動脈，也就是大動脈，被切割斷裂……噴出來的血液……將可遠達6英尺。

本段敘述夾雜著專業術語，對於一般電影觀眾帶有一定的醫學專業色彩。然而，這些醫療文字解說卻又不脫一般人已知的醫學常識領域，夾雜套用醫學術語與科普常識，不但增加本片對開膛手醫學專業的遐想，卻也不完全脫離一般觀眾的理解，充分強化醫學色彩，卻又不致難倒觀眾。

將開膛手作案的年代放入長遠的解剖學發展脈絡中來觀察，可以更容易看出《開膛手》的影像元素設定除了納入醫學偉大而悠久的歷史傳承，同時也尋求連結醫學具有的先進與理性科學意象。西方醫學具有悠久的歷史發展，特別是解剖醫學與人體解剖實驗，其理論源頭最早可以推往距今5000多年的埃及，其實已經是一門古老而嚴謹的學科，²⁵與《開膛手》所預設的先進與高度理性思維展現恰好相反。然而，愈是如此，就愈看出《開膛手》連結醫療迷思的企圖。影片中將開膛手的身分設定為具有醫學教育訓練或瞭解解剖的人，強調外科手術與解剖的先進，顯然是刻意強化醫學的神秘面紗，強調開膛手的醫學專業與階級色彩，並且藉此刻畫醫學具有的現代性。

開膛手的醫學聯想對於增添觀眾的恐懼與想像空間有著關鍵的地位，恐懼與敬畏一方面來自於醫學知識的深奧與壟斷，另一方面來自對於醫學知識長久以來的仰慕，認為醫學知識所代表的理性思維象徵著時代先端的知識。這兩個產生恐懼的因素在《開膛手》中皆得到充分的發酵。影片在對話與劇情中加入大量的醫學名詞，卻又不在一般民眾的理解範圍，此舉可驗證醫學名詞已經轉化為開膛手影片中的驚悚元素。另一方面，醫學知識被塑造成一門先進的技術與知識，在這部影片中也有刻意的著墨，開膛手被懷疑是具有醫療知識的專業人

25 一般咸認古埃及是第一個系統化研究人體解剖的古文明。古埃及研究發展人類解剖研究自有其實用目的，為的是提供製作木乃伊的技術。古埃及大約從西元前3400年就開始發展解剖研究(Van de Graaff 2002: 5-8)。醫學史家認為當時埃及、北非、義大利與希臘之間的交通相當發達，埃及在醫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透過北非大城市間接傳到希臘，而希臘又為西方醫學的基礎，埃及的醫學研究在人體構造、醫療器材、眼疾、婦女疾病、藥物治療等項目有重大的貢獻，對於希波克拉底的研究也有深遠的影響(Craik 1998: 6-7, 32)。

士。但是，以醫學史發展的角度來說，解剖學雖如影片所講是一門先進而遭壟斷的醫學歷史，但是解剖學同時卻也是一門具有悠久歷史的知識。大部分開膛手文學對屍體解剖的呈現均只停留在操作刀刀切割身體的層次，如《開膛手》影片中所提及的醫療詞彙與醫療觀念仍只及於科普層級的知識，無法也無意真正深入辯證更先進而深入的醫療專業知識，而這些科普級的技术層級並非晚至十九世紀才為醫界所發現，其實早為大眾所熟知。由此可知，諸如《開膛手》等開膛手文學儘管納入大量醫學元素，也成功為電影加入許多詭異的氣氛，但這些醫療科普知識的挪用卻也僅是單純賣弄醫療專業的形象。以《開膛手》為例，開膛手文學的醫療想像與呈現顯然有將命案連結到醫學專業的意圖，刻意以時空錯亂的醫療科普觀念，強化現代醫療所象徵的工具理性形象，賦予開膛手具備專業醫療知識的形象。

作為一門古老的知識，解剖醫學很早就開發出強調精準與紀律的醫學倫理與工具。同樣地，作為一門學科，傳統的大體解剖工具以及科普程度的醫療知識在十九世紀末已經不再是醫學上的驚奇發現。《開膛手》刻意賣弄基礎醫學詞彙，刻意展現冷峻而先進的醫學器材，非但強化醫師應當具有理性與專業的刻板形象，並藉由比對開膛手殘暴血腥且精密準確的屠殺手法，達成強烈反差與驚悚的效果。此外，也藉由將醫學知識與醫療工具塑造成先進而由少數菁英壟斷的知識，凸顯醫學在長久集體記憶中充滿苦痛與折磨的印象，並從中玩弄醫學具有工具理性的內在矛盾與衝突。

六、結語：誰是開膛手？

在《開膛手》的想像中，開膛手不只具有陰森血腥的形象，與許多螢幕兇手不同的是，開膛手同時具有醫學專業的訓練，由作案的難度與手法顯示他是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療人員。開膛手的螢幕形象融合了兇手與醫師的矛盾元素，殺人的人本來是救人的人，而原本用來救人的醫療專業，現在卻被用來殺人。套用卡洛(Noël Carroll)討論恐怖片原型的看法，諸如科學怪人、吸血鬼與變身怪醫都具有「融合」

(fusions)的特質，開膛手便是具有同樣的融合特質，他的特質融合多種身分元素，也同時僭越了刻板的認知劃分。連續殺人兇手融合了醫生的特質，救人的人同時也是殺人的人，這樣的身分僭越帶來了一定驚悚震撼的效果。這層驚悚與震撼的效果來自對於現代醫學作為一門工具理性的深刻信念，在僭越醫學作為一門學術專業的疆域之後，在顛覆了醫學作為救人工具的典型認知之後，緊接而來的是驚悚與魅惑。

事實上，醫學展現的理性與精確以及人類對於醫學表露的敬畏有著相當長遠的歷史。從醫學被建立成一門學術領域開始，醫學就僅是少數社會菁英獨享的知識。晦澀難懂的醫學術語與艱難且昂貴的醫術訓練，對於建立知識門檻產生了莫大的功效。作為一套工具理性，醫學始終比其他的科學知識領域來得壟斷，也來得冷峻。也因此，醫學知識在媒體呈現與大眾傳播上的誤用與濫用，也就格外增添幾分謎樣的色彩。

開膛手在集體想像中被賦予醫師的幻想，這樣的形象塑造從一開始就帶著神秘的想像氛圍。然而，在倫敦東區暗巷裡頭的開膛剖腹，與在手術房裡要求絕對精準的手術操作，有著相當大的差距。開膛手學研究中討論兇手移除了哪些器官，就算是兇手惡意為之，事實上與手術摘除器官的難度與專業也是天壤之別。因此，《開膛手》從一開始把開膛手賦予醫師的想像就已經充分顯露出醫學在電影呈現上的賣點：醫學帶來恐懼，恐懼帶來焦慮，焦慮帶來想像空間，所有的元素造就一部電影。但是，如果跳脫《開膛手》設定的推理範疇，從歷史史料中我們卻也發現，倫敦警方的調查線索來自各種說法不一的證詞與推論，警方懷疑的嫌疑犯身分包括醫師、屠夫、肉販、皮草商人、畫家、商人、律師、軍人、水手等各種行業。開膛手學將這些差異性極大的兇手背景放置於同樣的推理層次，從既有的目擊證詞與驗屍報告認定上述嫌犯都有犯案的可能，除了顯露出集體想像的恐慌無措，也顯示出想像缺乏決定性的證據與學理基礎。也因此，電影《開膛手》採納開膛手為醫生的說法，凸顯出開膛手被賦予醫師身分的想像，凸顯出對開膛手身分的想像謬誤，也就是，假設的基礎愈是不合理、愈是與觀眾認知發生衝突，電影所挪用的醫學元素，就更是具有

深刻的意義。

布魯(Clive Bloom)認為開膛手的魅惑來源就在於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傑克」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英國名字，因此也點出了任何人都可能是開膛手傑克的想像(Bloom 1988: 123)。朗斯黛爾(Kate Lonsdale)也點出類似的思考，她認為開膛手傑克的真實身分既「無從得知」也「任誰都是」，如此的內在矛盾增添了想像空間與魅惑：「就某方面說來，我們都不知道開膛手是誰」，但就另一方面說來，「我們都很清楚到底誰是開膛手」(Lonsdale 2002: 97)。關於開膛手真實身分的臆測最根本的矛盾在於，開膛手傑克「同時是無人、某人以及所有人」(Lonsdale 2002: 98)，因此眾多有關開膛手身分的討論就建立在片段的歷史事實、個人詮釋以及更為廣大的想像呈現，將開膛手的身分建構於集體的想像上。

《開膛手》在建構當代對開膛手想像的同時，復甦了舊世紀的醫學傳統，將消失於公眾視線的公開行刑帶回視覺影像創作，也將觀眾帶回公開行刑的集體參與感，更將古老醫學解剖的元素帶入大眾想像中。就這個角度看來，開膛手不但開啓了新世紀，也重新開啓了舊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對人體與醫學的熱愛，十七世紀解剖學對知識界的衝擊，甚至更為古老的醫學傳統，也都藉由開膛手的集體想像，重新進入當代的視覺映象。

《開膛手》的場景設定與情節刻畫，為開膛手的真實身分以及犯案動機提出一套邏輯完整的犯案動機推斷，影片中刻意營造身體遭受切割的制裁影像，也明顯企圖與醫學想像產生連結，如此費心的製作無非是企圖為「究竟誰是開膛手」這個問題找尋一個完整而合理的答案。誠如凱利所言，百年來大家都想知道開膛手的真實身分，但是，究竟這樣的問題反映出什麼樣的價值思考？這個問題本身蘊含的論證空間，可能跟問題的真正答案一樣具有思考的價值。

百年來，關於開膛手真實身分的臆測有著上百種的推論，每一種理論都有據以為論證基礎的證據與合乎理性邏輯的思考推論，每一套理論都以宛如真理的姿態示人，然而卻沒有一套理性論證可以完美解釋所有已知的證據。就這樣的角度的來看，開膛手的真實身分已經不得

而知，任何所謂的破案大公開充其量也都只是另一種邏輯辯證的假設推論，所有的推理只不過是在已知的論述層面重組、演繹與變化，任何的推論只能為已經相當豐富的開膛手學研究增加更多的研究資料，某種程度上排除對自己不利的證據，並且提出自認為合理的詮釋與指涉。因此，開膛手本身就是一個開放多元的符號，而各種關於開膛手身分的論述，則是針對開膛手符號所開發連結的多重意符與意指間交錯反射的語言與符號的連結，所有參與過這個問題的研究、討論與想像的人，都試圖以自己的論證推論為開膛手學的多元符碼連結增添元素，但也同時壓抑更多符碼元素的連結。就這樣的論述層次來說，包含本文在內，所有的開膛手理論都試圖找尋一條在意符與意指之間的穩定連結，試圖排除論述中線性穩定連結的元素，也壓抑符號連結過程中斷裂、分化、開歧或展延的動能。也就是說，所有提問與回答「誰是開膛手」的人，都在為原本即已繁雜的開膛手學論述增加更多符號連結的可能性，也為開膛手學交雜喧騰的論述灌輸壯大增長的能量。

由這個角度來看，《開膛手》於片頭引用開膛手在寫給警方信中的句子：「有一天人們會回頭看，然後說，是我催生了二十世紀。」這句話也將產生新意，就想像承續的角度來看，開膛手的傳奇不但終結十九世紀，跨越二十世紀，更是開啓了二十一世紀。而且只要繼續有人為開膛手文學提供創作與想像，這個傳奇也將延續。就開啓工具理性思維的角度來看，二十世紀發展的細微醫學與刑事鑑定技術，提供了詮釋開膛手研究更為廣闊以及更為依賴理性推論的思考角度，就此角度來看，開膛手也延續了研究者對工具理性的信仰，也以此開啓了新的世紀。

因此，儘管百年之後的倫敦跟開膛手作案當時在各方面已有極大的改變，在加入醫學想像的氛圍之後，《開膛手》提供開膛手身分想像的角度與題材更為豐富，這齣集體想像的黑暗暴力劇並未因為年代久遠而退燒，相反地，在融入醫學的想像元素以及好萊塢電影工業資源的投注之後，開膛手學的論述已經在沃考維茲闡釋的「家庭暴力劇」之外，呈現跨越文化與國家疆界的醫學倫理暴力劇，開膛手學論述也得以持續不斷擴張、演繹並延續。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Castiglioni, Arturo (卡斯蒂廖尼) 著，程之范譯。2003。《醫學史》(*A History of Medicine*)上、下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Margotta, Roberto (瑪格塔) 著，李城譯。2004。《醫學的歷史》(*History of Medicine*)。廣州：希望出版社。
- Porter, Roy (波特) 主編，張大慶譯。2008[2001]。《劍橋插圖醫學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cine*)。台北：如果出版社。

二、英文書目

- Ackerknecht, Erwin H. 1982. *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 revised edi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Altick, Richard D. 1973. *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 New York: Norton.
- Beadle, William. 1995. *Jack the Ripper: Anatomy of a Myth*. Dagenham, Essex: Wat Tyler Books.
- Begg, Paul. 1988. *Jack the Ripper: The Uncensored Facts*. London: Robson Books.
- . 2004. *Jack the Ripper: The Definitive History*.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 Bloom, Clive. 1988.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Jack the Ripper, Legend and the Power of the Unknown,” in *Nineteenth Century Suspense: From Poe to Conan Doyle*, edited by Clive Bloom, Brian Docherty, Jane Gibb and Keith Shand, pp. 120-137.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Carroll, Noël. 1990. *The Philosophy of Horror or Paradoxes of the Hear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Craik, Elizabeth M. trans. and ed. 1998. *Hippocrates: Places in Ma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unningham, Andrew. 1997. *The Anatomical Renaissance: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Anatomical Projects of the Ancients*. Aldershot: Scolar Press.
- Doyle, Arthur Conan. 2003. “The Adventure of the Speckled Band,” in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Vol. 1, pp. 307-325. New York: Barnes & Noble Classics.

Evans, Stewart P. and Keith Skinner. 2001. *The Ultimate Jack the Ripper Companion: An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New York: Carrol & Graf Publishers.

Fido, Martin. 1987. *The Crimes, Detection and Death of Jack the Rippe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Foucault, Michel. 197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lated by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Gallery, Hayward. 2000. *Spectacular Bodie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Human Body from Leonardo to Now*.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linert, Ed. 2005. *East End Chronicles*. London: Allen Lane.

Hinton, Bob. 1998. *From Hell: The Jack the Ripper Mystery*. Abertillery: Old Bakehouse Publications.

Hobbs, Dick. 2004. "The History of East London: a Stroll Down Felony Lane," in *Urban Culture: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 IV, edited by Chris Jenks, pp. 135-16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Keating, P. J. 1973. "Fact and Fiction in the East End," in *The Victorian City: Images and Realities*, Vol. 2, edited by H. J. Dyos and Michael Wolff, pp. 585-60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Kelly, Alexander. 1973. *Jack the Ripper: A Bibliography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London: Association of Assistant Librarians.

Kemp, Martin and Marina Wallace. 2000. *Spectacular Bodie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Human Body from Leonardo to Now*.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night, Stephen. 1986. *Jack the Ripper: The Final Solution*.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Lonsdale, Kate. 2002. "Rounding up the Usual Suspect: Echoing Jack the Ripper," in *Functions of Victorian Culture at the Present Time*, edited by Christine L. Krueger. pp. 97-114.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 Magellan, Karyo. 2005. *By Ear and Eyes: The Whitechapel Murders, Jack the Ripper and The Murder of Mary Jane Kelly*. Chippenham, Wiltshire: Longshot Publishing.
- Meikle, Denis. 2002. *Jack the Ripper: The Murders and the Movies*. London: Reynolds & Hearn Ltd..
- Miles, Steven H. 2004. *The Hippocratic Oath and the Ethics of Medicin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Alan and Eddie Campbell. 2004. *From Hell*, new edition. Marietta: Top Shelf Productions.
- Murray, Alex. 2004. "Jack the Ripper,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and the Search for Spiritual Deliverance in White Chappell, Scarlet Tracings," in *Critical Survey* Vol. 16 No. 1: 52-66.
- Neuburg, Victor E. 1973. "The Literature of the Streets," in *The Victorian City: Images and Realities*, Vol. 1, edited by H. J. Dyos and Michael Wolff, pp. 191-20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Nutton, Vivian. 1996. "The Rise of Medicin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cine*, edited by Roy Porter, pp. 46-7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dell, Robin. 2006. *Ripperology: A Study of the World's First Serial Killer and a Literary Phenomenon*. Kent, Ohio: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Scott. 1995. *Jack the Ripper: A Reference Guide*.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 Pickstone, John. 1996. "Medicine,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cine*, edited by Roy Porter, pp. 260-29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rter, Roy. 1996a. "Medical Scienc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cine*, edited by Roy Porter, pp. 136-17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6b. "Hospitals and Surger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cine*, edited by Roy Porter, pp. 176-21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2. *Blood and Guts: 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 London: Penguin Books.
- Richardson, Ruth. 2000. *Death, Dissection and the Destitute*, 2nd e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sen, George. 1993.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awday, Jonathan. 1995. *The Body Emblazoned: Dissection and the Human Body in Renaissance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ennett, Richard. 1994. *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Norton.
- Singer, Charles. trans. and ed. 1999. *Galen: On Anatomical Procedur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uden, Don. 2005. "The Murder in Cartin's Court," in *Ripper Notes* Issue 21 (January 2005): 4-12.
- Storey, Neil R. 2004. *A Grim Almanac of Jack the Ripper's London 1870-1900*. Gloucestershire: Sutton Publishing.
- Sugden, Philip. 2002.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Jack the Ripper*,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Carrol & Graf Publishers.
- Van de Graaf, Kent M. 2002. *Human Anatomy*, six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 Walkowitz, J. 1980. *Prostitution and Victorian Society: Women, Class,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2. "Jack the Ripper and the Myth of Male Violence," in *Feminist Studies* 8(3): 542-574.
- . 1992. *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London: Virago.
- Wolf, A. P. 1993. *Jack the Myth: A New Look at the Ripper*. London: Robert Hale.
- Wolff, Michael and Celina Fox. 1973. "Pictures from the Magazines," in *The Victorian City: Images and Realities*, Vol.2, edited by H. J. Dyos and Michael Wolff, pp. 559-58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三、網站

- 「開膛手傑克檔案」(Casebook: Jack the Ripper) ° <http://www.casebook.org>
- 網路電影資料庫 ° <http://www.imdb.com>